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外国文学评介丛书一

肖洛霍夫

 **eBOOK**
网络资源 中国风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评介丛书》是一套以学生、教师以及广大爱好文学的青年为主要对象的通俗读物。它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形式向读者系统地介绍从古至今世界各国著名的文学作家和他们的优秀作品。

这套丛书将引导青年朋友去漫游一番那绚丽多彩、浩瀚无边的文学世界——从古希腊的神话王国到中世纪的骑士、城堡；从铁马金戈的古战场到五光十色的繁华都市；从奔腾喧嚣的河流、海洋到恬静幽美的峡谷、森林、农舍、田庄……它将冲破多年来极左路线对文学领域的禁锢和封锁，丰富青年朋友的精神生活，为青年朋友打开一扇又一扇世界文学之窗，让读者花费不多的时间就能游历世界的每一角落，浏览各国人民今天、昨天、前天直至遥远的过去的丰富多采的生活图景，去体会他们的劳动、爱情、幸福、欢乐以及痛苦、忧伤、斗争、希望……它将帮助青年朋友增长知识，开阔眼界，陶冶高尚的情操，提高文学素养。它是青年朋友阅读、欣赏外国文学作品的良好的向导和游伴。

这套丛书由若干分册组成，每一分册既是一本独立、完整的著作，又是全套丛书中的一个单元；分则为册，合则为套。

这一分册介绍的是当代苏联著名作家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和他的主要作品《顿河故事》、《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和《人的命运》。对肖洛霍夫创作的艺术特色也作了较详细地评介。

作家生平与创作 小引

作家贡献于人类的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他的作品，他通过艺术形象向读者描述自己在现实世界里的所见、所闻、所想，表现自己的爱憎和希望，展示自己的心灵。作家所经历的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和他的深刻感受，都会在作品中得到反映。苏联著名作家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也不例外。他是在俄国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的，他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年，一九一五年，正是俄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举行罢工起义的一年，在其后的八十年里，俄国以及整个世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他亲身经历了国内战争、农业合作化运动、卫国战争等各个重大历史阶段。他的一生遇见了那么多的惊涛骇浪、艰难险阻，他深刻地体味过革命斗争胜利的欢乐，也曾为工人阶级和整个人类所经受的苦难和挫折而忧伤和痛心。

肖洛霍夫生长在顿河地区，他深深地热爱故乡的土地和故乡的人民，他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这里。肖洛霍夫的一生是和哺育他成长的顿河联系在一起的，作家的名字与这条美丽的俄国河流的名字密不可分。每当提起顿河的时候，自然要想起它的歌者肖洛霍夫，而在谈到作家肖洛霍夫的时候，也必然会在我们的眼前浮现出长流不息的静静的顿河。

顿河位于苏联欧洲部分国土的南方。俄国古老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中曾经描写过它，但丁在《神曲》里也提到过它。这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的俄国河流，因为在它的两岸居住着自由的哥萨克。

哥萨克原本是俄国内地的农奴，他们受不了沙皇和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揭竿而起，逃到了顿河流域落户。他们十分勇敢，性格粗犷，酷爱自由，崇尚正义，比一般农民更有集体感。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拉辛、布拉文、普加乔夫。至今，在顿河两岸，在辽阔无边的顿河草原上，还流传着英雄的悲壮史诗、起义者的传说以及瑰丽的哥萨克民间歌曲。这一切为这条河流平添了英雄主义的传奇色彩和异域的情调，使它闻名于世。

依傍着这条美丽的河流坐落着维约申斯克镇。镇上，一幢幢白色的哥萨克房舍，在阳光下屋顶泛着红光。街道绿茵很少，尘土飞扬。离河岸不远，在碧树繁花中掩映着一幢二层的楼房，大家都知道，作家肖洛霍夫就住在这里。

肖洛霍夫中等身材，头发已经灰白，高高的苏格拉底式的额头，目光诚挚善良，说起话来嗓音有些低哑，语调非常柔和。他虽然年过七十，但步履矫健，动作敏捷，情绪高昂，有着军人的姿态和青年人的朝气。他在哥萨克中间有许多好朋友，人们喜欢和他交谈，他的言谈使人感到轻松，幽默。他有非凡的讲故事的天赋。

肖洛霍夫对顿河土地和哥萨克人民怀有一颗赤子之心。人们称肖洛霍夫为静静顿河的歌者。他在他那些举世闻名的小说里，描述了称之为哥萨克的那块天地里的世世代代人的生活，展示了这种生活的史诗般的、充满泥土气息的、生动绮丽的画卷，描绘了哥萨克在革命和战争中的激烈沸腾的斗争生活，他们“脱胎换骨”的苦难，以及他们最后走向新道路、建设新生活的历史进程。肖洛霍夫用自己的创作为人们打开了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

童年

肖洛霍夫的作品写的是顿河哥萨克，因而有不少国外读者和批评家常把肖洛霍夫本人也当成顿河哥萨克，甚至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访问美国，在“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宴会上介绍肖洛霍夫时也说：“这位顿河哥萨克……”其实肖洛霍夫并不是顿河哥萨克，而是一个“外地人”。

一百多年以前，作家的祖父从梁赞省迁居顿河军屯州维约申斯克镇落户。最初他在一家外地人的店铺里当店员，后来娶了主人的女儿，自己也就成了商人。他有四个儿子，四个女儿，第二个儿子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就是作家的父亲。

作家的父亲也像作家的祖父一样，曾作过商店店员，后来还作过磨坊经理等，职业经常变换，生活并不富裕。他只受过小学教育，但极喜欢读书，订阅了各种文艺杂志，还收藏了许多文艺书籍，正是父亲首先培养了肖洛霍夫对文学的兴趣。

作家的母亲婀娜斯塔西娅·达尼洛夫娜，出身农家，是乌克兰人，早年在肖洛霍夫祖父家作使女。那时候作家的父亲就深深地爱上了她。这桩门第不相称的婚姻遭到作家祖父母的坚决反对，他们把使女嫁给了一个年老退休的哥萨克阿塔曼，并且强行为儿子物色新娘。儿子坚决反抗，要求分家。分家以后，作家的父亲不怕非议，把婀娜斯塔西娅·达尼洛夫娜作为女仆领回了自己的家。等到一九一二年她的第一个丈夫去世以后，她就正式成了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的妻子。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在他周围的同事们看来，是文化教养很高的人。同事们都为他娶了一位不识字的普通农家女子而惊奇，他却回答道：“你们什么也不明白，她不是女人，而是一幅画。”或许，父亲在爱情上表现出的执拗性格和平等思想，以及他那艺术家的眼光也赋予了未来的作家。

作家的母亲聪敏贤惠，端庄美丽，性格坚强。作家幼年出外读书给家里来信的时候，母亲总是拿着信求父亲一遍又一遍地念给她听。长此以往就使父亲感到有些不耐烦。于是母亲为了使自己能读儿子的信并能给儿子写信，便开始学习读书识字。她居然很快地学会了。从此母亲和儿子就愉快地直接通起信来。

肖洛霍夫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生于顿河军屯州维约申斯克镇克鲁日伊林村。他是父母的独生子，儿时聪明活泼，常和哥萨克的孩子们一同游玩，他们特别喜欢作打仗的游戏，树枝当骏马，石块作炮弹，他们在谷底、溪旁分成两队，英勇交战；他还喜欢在夜间同哥萨克的孩子们一起去牧马。他身体瘦弱最能吸引他的是钓鱼，他是个钓鱼迷，常常拿起钓竿和小鱼饵盒就走了，村庄里整日再也不见他的踪影。有时父亲会非常担忧地说：“怎样才能叫米沙扔掉鱼竿呢？整天跑得无影无踪，怎么也找不到他，我害怕他会淹死的。”他还喜欢观看色彩缤纷的哥萨克传统婚礼，喜爱热情奔放的哥萨克舞蹈，爱听动人的顿河民歌和民间故事。那时而碧蓝、时而混浊的顿河流水；那沉浸在蓝灰色烟雾中的夏日草原；春耕秋收，割草捕鱼，愉快而沉重的劳动；哥萨克的古老风俗、丰富多采而又愚昧无知的生活，这一切都深深地印进了他那幼小的心灵。

肖洛霍夫到了六岁那年，父亲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他读书识字。他非常聪明，学得很快，只用了六七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一年的课程。

七岁的时候进入村中小学念二年级。小学没有毕业，他就得了眼病。那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不久的一九一四年夏天，父亲把他送进莫斯科眼科医院治疗。他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月，那时候从前线来的几个伤兵也住在那里。医院的情形给九岁的肖洛霍夫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后来将医院里这些儿时的印象都写进了他的《静静的顿河》这部作品里，使作品变得更加栩栩如生了。

一九一五年以后，肖洛霍夫在城镇和莫斯科等地的几个学校里读过书。一九一八年国内战争开始，肖洛霍夫刚读完四年级就中断了学习，并且从此永远地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活。肖洛霍夫从学校回到家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父亲的藏书，阅读一切能弄到的书。他读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以及欧美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他的面前展开了广阔的生活图景和丰富的人生的画卷，同时也为他成为作家奠定了知识基础。

国内战争成了他的学校

“如果说艺术家的生平是他认识世界的根本渠道的话，……那么肖洛霍夫的人生命运所遇到的恰是俄国社会革命所经历的最湍急最深沉的一股激流。在哪里能遇到哥萨克大地上那种呼啸怒吼的狂风暴雨呢？……当国内战争在顿河上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候，肖洛霍夫还是一个孩子。国内战争成了他的学校，并且磨炼了他革命者的意志，同时也砥砺了他艺术家的天赋才能。”（费定语）

国内战争时期，肖洛霍夫和父母住在顿河上游叶兰斯克镇和卡尔金镇。一九一九年红军后方的大规模的哥萨克暴动，就发生在这里。肖洛霍夫目睹了红军和白军的激烈斗争，贫农和富农的斗争，哥萨克家庭内部因革命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这种种事件都给少年肖洛霍夫极强的印象。他很早熟，小小的年纪，已经有了丰富的阅历，有了分辨事物的能力，能够深入思考问题，这是他与他的同龄人不太相同的地方。

一九二一年，顿河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五岁的少年肖洛霍夫开始了独立的劳动生活。他生气勃勃，精力充沛，是一个革命积极分子和活跃分子，同时做着许多工作。在卡尔金镇革命委员会做办事员，做扫盲教师，做人口登记工作，为苏维埃政权做宣传工作。在哥萨克中间，在俱乐部里，在大会上，到处都能看见肖洛霍夫的身影。他倾听人们的谈话，仔细观察一切事物，作宣传演说，机灵能干，工作不做完决不休息。

苏维埃政权初建时期，肖洛霍夫在家乡的群众宣传教育工作中，业余剧团起了很好的作用。肖洛霍夫参加业余剧团，还是剧团的骨干之一，他的主意层出不穷，很会演喜剧角色，演出时常常加进去自己编的即兴台词，十分幽默，引起观众哄堂大笑。他也演奏吉他、手风琴。剧团缺少剧本，肖洛霍夫就自己偷偷地写剧本。有一次，大家排剧只排了一半，原因是肖洛霍夫迟迟不将剧本的后一半交出来，导演坚决要求他快些拿来，并说：“你在破坏演出。”肖洛霍夫不好意思地说：“就是这些。脑汁用尽了。灵感没了……”他无意中泄露了自己的秘密，大家才知道，剧本原来不是他弄来的，而是他自己写的。他写剧本，首先是根据当时宣传工作的需要，当然这也成了他文学创作上的初步尝试。他写的剧本中有一个叫《他们的风俗和习惯》，描写国内战争时期的顿河生活，白军的胡作非为，红军的到来，还有一个剧本叫《常胜将军》。这些剧本都没有存留下来。

一九二一年八月以后，肖洛霍夫做了顿河粮食委员会采购办事处办事员，后来志愿参加留在卡尔金镇的粮食征集队。

一九二一年，顿河一带出现了马赫诺、佛明、麦列霍夫、马斯洛夫、科列斯尼科夫等匪帮，他们残酷地杀害粮食工作人员和苏维埃干部。匪帮多半是当地人，对情况一清二楚，几乎认识每一个干部和征粮队员，常常对征粮队员和苏维埃干部发动袭击。许多同志牺牲了，埋葬在开满毋忘依花的美丽的草原上。征粮队员、苏维埃干部、民警经常手持长枪在办公室过夜，因为两、三个人是无法对付匪帮的。

肖洛霍夫和征粮队一起同匪帮战斗，他们常常不停地在草原上奔走，度过了许多紧张的日日夜夜。有一次，在康科夫村附近的战斗中，肖洛霍夫被马赫诺匪帮俘虏。肖洛霍夫那时才十五六岁，由于身体瘦小就显得更加年幼。他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他多么希望活下去啊！但他还是下定决心准备英勇就义。肖洛霍夫等死等了两天两夜。匪首马赫诺亲自审问他，决定枪毙他。幸亏房主人，一个大胆无畏的哥萨克站出来维护了肖洛霍夫，他对马赫诺说：

“难道你连一个孩子也要杀害吗？他是有母亲的，而你也有母亲……”

这样，马赫诺才释放了肖洛霍夫，但威胁说，如果再次落到他手中，他一定绞死肖洛霍夫。

征粮队中的战斗经历，国内战争中的各种事件，这些都是肖洛霍夫生活的课堂，为他创作积累了无比丰富的素材。

参加“青年近卫军社”

一九二二年，顿河的匪帮被平定，国内战争终于结束了。从战斗中刚刚走出来的肖洛霍夫，很想把他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各种感受，都写出来。这样他就开始写小说，也寄了几篇给莫斯科的共青团报刊和《星火》杂志，但是都不成功，未能发表。这并没有使肖洛霍夫灰心，反而更激起了他的勇气和进取心。他为了进工农速成学校和进行文学创作，毅然决定去莫斯科。

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七岁的少年肖洛霍夫从偏僻的顿河村镇，只身来到莫斯科。但是进工农速成学校的想法，因他没有工龄而未能实现。像肖洛霍夫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技术专长的少年，在莫斯科居住和工作是有困难的。他为了维持生活，便去做泥瓦匠和装卸工人。后来做了房管所的会计和办事员，情况才稍有改善。

那时候，在莫斯科聚集着刚从战场归来的许多从事文学的青年，有来自远东游击队的法捷耶夫，有来自英雄的恰巴耶夫师的富尔曼诺夫，还有吉洪诺夫、维什涅夫斯基、巴格利茨基等人，在这一大批热爱学习、热爱文学创作的青年中间，肖洛霍夫可能是年纪最小的一个。

这些青年朝气蓬勃，有人在工农速成学校学习，有人在进修班学习，有人已经在编辑共青团的报刊杂志。肖洛霍夫如他在《三个纽扣》这篇小品文中所反映的那样，十分羡慕这样的生活。

一九二二年秋，在共青团中央的倡议下，成立了共青团的作家组织“青年近卫军社”。刚刚跨入文学队伍的年轻的诗人和作家们主张以现实主义原则塑造艺术形象，提倡善于“在每一件琐碎小事的后面发现世界革命。”他们的作品反映了青年的事业和生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冲突和矛盾。这些作品多半发表在《青年近卫军》杂志以及这一杂志社出版的文艺作品选集上。

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朗读自己的作品，开文学晚会，常常请老作家绥拉菲莫维奇担任晚会的主席。肖洛霍夫很想结识这些作家，很想有机会请教文学战线上的前辈。于是他就拿了自己的习作去找绥拉菲莫维奇。这位老作家是肖洛霍夫的同乡，也是顿河人。在一次文学晚会上，绥拉菲莫维奇向听众推荐了自己的年轻的同乡。肖洛霍夫在晚会上朗诵了《顿河故事》中的一个短篇。他朗读得不很生动，吐字也不太清楚，有些单调，没有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在晚会上，肖洛霍夫的好友库达朔夫把他介绍给“青年近卫军社”书记科洛索夫。肖洛霍夫向科洛索夫表示，要求加入“青年近卫军社”。科洛索夫接受了肖洛霍夫的要求。这样，肖洛霍夫就成了“青年近卫军社”的正式成员。

“青年近卫军社”的活动对肖洛霍夫创作的开始阶段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当时《青年近卫军》杂志为共青团作家开辟了一个宿舍，在这里住着十二个人，他们学习热情很高，为了提高文学写作技巧，在这个宿舍里开办了两个文学进修班。一个是由尼·阿谢耶夫主持的诗歌班，另一个是由奥西普·勃里克和维克多·施克洛夫斯基领导的散文班。勃里克和施克洛夫斯基二人都是文学组织“诗语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是形式主义流派的理论家。施克洛夫斯基的多数著作是阐明文学作品的情节结构的方法，他把情节结构方法看成艺术形式的永恒的法则。他把艺术作品解释为美学最珍贵的“手法”的总和。勃里克以研究古典诗歌的叠音、音韵和结构著称。他曾同马雅可夫斯基合作，积极宣传“艺术左翼阵线”的“事实文学”、“社会定货”的理论和口号，要求艺术联系现实。

肖洛霍夫作为“青年近卫军社”的成员，参加散文班学习。第一课由勃里克主讲，课程内容是《论情节》。教师以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过火》（1885）为例，讲述了小说的情节结构问题。课后要求每个参加学习的人都要试写一篇短篇小说，择取苏维埃现实生活中的某个片断，运用契诃夫的处理情节的手法，塑造自己的形象和典型。对待这项作业，肖洛霍夫较之其他成员尤为认真，他巧妙地把契诃夫《过火》中的情节和结构方法，运用到他熟悉的哥萨克村镇的现实生活当中去。他的这篇习作最近似契诃夫在《过火》中所运用的手法。这篇小说习作和他前不久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小品文《考验》（1923年9月19日），题材极为相近。

肖洛霍夫的另一篇小品文《“钦差大臣”》（1924年4月12日），显然受到果戈理《钦差大臣》的影响。

这两篇小品文，从情节的安排到人物的塑造，从开头和结尾、铺垫和照应，到每一次的重复和细节的处理……肖洛霍夫像中学生运用公式演算数学学习题一样，学习着契诃夫和果戈理的艺术技巧。尽管这两篇小品文模仿的痕迹很重，显得生硬和勉强，肤浅而幼稚，然而，这种刻意的学习却是肖洛霍夫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的极有意义的第一课，尤其在二十年代，这种学习精神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苏联二十年代流行的文学派别，无论是未来主义者，还是无产阶级文化派，或是其他一些派别，很多都反对继承文化遗产。当他们宣称要把普希金、托尔斯泰的光辉艺术扔进大海里去的时候，肖洛霍夫却在虚心地向艺术大师们讨教，孜孜不倦地从丰富的艺术宝库中汲取营养，渴求着借鉴古典作家们的现实主义传统。后来，肖洛霍夫自己说过，不仅契诃夫给了他影响，而且一切优秀作家对他都是有影响的。向古典大师学习，学习他们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成为肖洛霍夫达到成熟作家水平的决定性因

素之一。

重返故乡

肖洛霍夫在莫斯科生活了两年，一九二四年年中他决定回到顿河故乡去。原因是，一方面肖洛霍夫在莫斯科收入极其微薄，生活十分困难，常常吃不饱，有时一天只有一条小鱼和两三个马铃薯；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肖洛霍夫深深感到，他熟悉顿河生活和顿河人民，他要真实地表现生活，就必须深入到他真正熟悉的那种生活当中去，就必须回到他要描写的那些人的近旁。于是，他毅然离开了莫斯科的文学朋友们，重返顿河故乡。

肖洛霍夫回到顿河后，物质生活仍然很困难，然而就在困难的条件下他表现出旺盛的创作力量。从一九二四年年中到一九二六年，总共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写了二十余篇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道路》，这些小说一篇接一篇地出现在共青团的刊物上。肖洛霍夫在发表这些短篇小说时，他才只有十八九岁。后来它们收集在《顿河故事》中。

二十年代苏联文学界存在着许多文学流派和文学团体，如意象派，无产阶级文化派，未来主义者以及后来的“艺术左翼阵线”，“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冶铁坊”，“谢拉皮翁兄弟”，“山隘”等等。他们的创作原则，反映现实的角度各不相同，他们的宣言、口号、文学晚会的海报，贴满了莫斯科的大街小巷，五光十色，使人眼花缭乱。肖洛霍夫虽属“拉普”成员，却很少受到当时这些派别的不良影响。他身居顿河之一隅，描写的是刚刚发生在顿河大地上的事件，因而更多地表现了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较少地受到首都文学界的影响。他的这些短篇小说独放异彩，新鲜而明快，一个有出息的作家正在孕育诞生。

一九二六年新莫斯科出版社将肖洛霍夫的这些短篇小说搜集出版，书名为《顿河故事》。老作家绥拉菲莫维奇为这本书写了序言，他盛赞说：“肖洛霍夫同志的短篇小说像草原上的鲜花一样，生气勃勃，色彩鲜艳，朴素、鲜明，所讲的故事，使人感觉仿佛就在眼前发生的。语言形象是哥萨克说话时所用的那种富有色彩的语言，简洁，而这种简洁却充满着生活气息、紧张和真实。在紧张尖锐的地方善于掌握分寸，因此使这些作品能够沁人肺腑。作家对于所讲述的事物具有广泛深入的了解。他的眼光敏锐，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善于从许多特征中挑选出最典型的特征。所有这些条件都说明，肖洛霍夫同志将会发展成为一个卓越的作家。不过还需要学习，需要认真写好每一篇东西，不要操之过急。”

雏鹰展开了矫健的翅膀

一九二五年前后，肖洛霍夫在写作《顿河故事》的时候，就酝酿创作一部描写顿河哥萨克生活和斗争的长篇小说。一九二六年，肖洛霍夫为写作这部长篇小说迁到维约申斯克镇居住。这个镇是一九一九年红军后方顿河上游哥萨克暴动的中心，肖洛霍夫迁居到这里便于搜集长篇小说所需要的素材。他常常到哥萨克中间去访问，了解情况。他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原型之一——哥萨克叶尔玛科夫，就是他常去访问的对象之一。他同叶尔玛科夫不只一次地长时间地交谈，问他国内战争的事

情。叶尔玛科夫亲身参加了国内战争，所以谈得非常仔细。肖洛霍夫还常常到诺沃契尔卡斯克博物馆图书室去搜集材料，有时连续数天坐在那里阅读旧杂志，尤其是《顿河浪潮》。

他要描写的人们就在近旁，材料伸手可得，自然景色也在他周围，等一切都准备就序，他就开始埋头写作了。日以继夜，他把自己关在一间草棚里。周围的亲友、邻居们把肖洛霍夫写长篇小说当成新闻。

《静静的顿河》的初稿最初还曾经有过另外一个名字：《顿河乡土》，情节是从十月革命前夕开始的，是从描写科尔尼洛夫阴谋政变、哥萨克向彼得格勒进军去镇压革命开始的。肖洛霍夫写了四个印张的样子，觉得读者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哥萨克是些什么样的人？什么是顿河军屯州？”作家为了使他描写的哥萨克在革命和战争中的现实表现有其历史依据，便放下了已写的部分，改从哥萨克的日常生活、和平劳动、古老风俗，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写起，而把最初的原稿纳入《静静的顿河》第二部。肖洛霍夫要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描写哥萨克在两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和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的历史，揭示卷进一九一四——一九二一年间发生的各种事件中的个别人的悲剧命运。

一九二七年秋，肖洛霍夫写完了《静静的顿河》第一部，交给了《十月》杂志编辑部。编辑部审阅后，认为这部小说是描写旧时哥萨克生活的，没有什么迫切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要求作家做大量删节，然后才能发表。这部稿子最后交给责任编辑绥拉菲莫维奇审阅。绥拉菲莫维奇不愧为大作家，他的眼力是非凡的，他发现了这部长篇小说是一部真正的杰作，他批准不做任何改动，全文发表。

同年，绥拉菲莫维奇为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邀请了一些著名的外国作家来家里作客。他把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推荐给他们，把作者也介绍给他们。这些作家中有昂利·巴比塞、贝拉·伊列什、马丁·安德逊·尼克索等人。绥拉菲莫维奇指着窗台上的一叠打字稿，对作家们说：

“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一部新小说的手稿。请记住它的名字——《静静的顿河》，作者——米哈伊尔·肖洛霍夫……”

绥拉菲莫维奇向大家介绍说：

“朋友们！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位俄国大作家，目前还没有人知道他，但是请记住我的话，很快全俄国都会知道他，两三年之后——全世界都将会知道他！……从一月起我们将发表《静静的顿河》。”

一九二八年一月至四月，《十月》杂志发表了《静静的顿河》第一部，五月至十月发表了第二部。绥拉菲莫维奇首先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九日《真理报》上著文，热情赞扬肖洛霍夫和他的《静静的顿河》，把肖洛霍夫比作草原上突然展开巨大翅膀的雏鹰。赞赏肖洛霍夫语言的鲜明、独特、丰富多采，赞赏他塑造人物的巨大才能，并说：“肖洛霍夫没有在任何地方，没有在一处讲过阶级、阶级斗争。但是，像在许多大作家的笔下一样，随着整个伟大时代的逐渐展现，这种阶级分化，在故事的脉络之中，在人物的描写之中，在事件的联系之中，无形地逐渐加强起来，愈来愈多地被感觉到。”

绥拉菲莫维奇第一个发现了肖洛霍夫，第一个向苏联和世界介绍了肖洛霍夫。

一贯重视发现和培养优秀作家的高尔基也注意到了肖洛霍夫。

或许，从某种意义上应该说，善于发现天才，其价值不亚于天才本身的

价值，这是因为在文学领域中，珍贵的宝石，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承认和挖掘，就有可能被埋没，人们会永远失掉一块无价的宝玉。《静静的顿河》的命运，正证明了这一点。

《静静的顿河》的发表，成为苏联文坛上的大事。肖洛霍夫一举成名，苏联国内外都注意到了他。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也都给予好评。高尔基说：根据第一部判断，肖洛霍夫是有才能的。卢那察尔斯基将《静静的顿河》同所有时代的俄国文学杰作相提并论。

这部作品很快被介绍到国外，最早介绍的是德国。一九二八年，德国诗人和剧作家安多尔·加勃尔的夫人把这部作品译成德文，这就是《静静的顿河》最早的国外译本。肖洛霍夫与当时世界上的三位天才作家：雷马克、奥尔德顿、海明威齐名，蜚声欧洲文坛。

《静静的顿河》从欧洲迅速又传到了亚洲，日本有了译本，日本著名作家小林多喜二数次在日本报刊上推荐这部作品。中国也出现了这部作品的中译本，这个译本成了鲁迅编的《现代文艺丛书》之一。一九三一年鲁迅先生为这个译本写了后记，将肖洛霍夫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静静的顿河》的迅速流传，正如绥拉菲莫维奇预言的，两三年内全俄和全世界都知道了肖洛霍夫。

关于《静静的顿河》的争论

《静静的顿河》虽然很快获得了苏联国内外的赞誉，但这只是它的命运的一个方面。在当时还有一些人对这部作品持否定态度，并对它的作者有所怀疑和进行谴责，这便是小说命运的另外一个方面。

当时许多批评家和读者对《静静的顿河》所描写的顿河地区的哥萨克的生活不够熟悉、不够了解，对十月革命前后和国内战争时期的顿河地区的错综复杂的形势及其历史原因没有进行深入具体的剖析，所以很自然地产生了对《静静的顿河》的许多误解。一些人弄不清《静静的顿河》是什么样性质的书，因而也弄不清肖洛霍夫是属于哪个阶级的作家。

很多批评家认为，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表现了作者在反映现实时的客观主义、自然主义、超党性、抽象人道主义。有人指责肖洛霍夫是动摇的农民作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同路人作家；有人认为他是富农意识的传播者；还有人痛斥他是无产阶级文学中的异己分子。拉普专门为《静静的顿河》召开了三次讨论会：两次在莫斯科召开（1928年和1929年），第三次在罗斯托夫（1930年）。最后一次会议的主要报告人是罗斯托夫历史学家扬切夫斯基，报告的题目为《反动的浪漫主义的情趣》，他的报告对《静静的顿河》作了系统的批判，对肖洛霍夫作了彻底的否定，他称《静静的顿河》是同无产阶级敌对的反动的浪漫主义的作品，称肖洛霍夫为“哥萨克富农和外国贵族的思想家”。

尽管这些否定意见十分尖刻，或在刊物上发表，或是在会议上发言，但它们毕竟是学术讨论。最使作家感到痛心的是有人对他本人进行直接攻击，这种情况延续了好几年，严重地影响了肖洛霍夫的情绪，干扰了他的创作。

当时提出的第一个严重问题是，有人散布肖洛霍夫出版《静静的顿河》是剽窃了别人的手稿。

一九二八年，《静静的顿河》刚刚发表，它的油墨香气还没有散尽，这

种流言就开始传播，先是在口头上，而后在刊物上，说《静静的顿河》完全不是肖洛霍夫写的，而是某个在国内战争中被打死的白军军官写的，肖洛霍夫偷了他的手稿。在顿河岸罗斯托夫的报刊上，在《未发表的〈静静的顿河〉的篇章》的标题下，刊登了三篇专论，谈到肖洛霍夫进行文学剽窃的流言，并说关于此事的一切材料存在全俄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或检查机关，或存于报刊杂志编辑部里。

肖洛霍夫被这种流言激怒了。在一九二九年三月中旬，他拿着自己的一箱子《静静的顿河》手稿，从顿河来到莫斯科《真理报》编辑部，将手稿全部交给了《真理报》编辑部的常务书记玛丽娅·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列宁的妹妹。根据《真理报》的建议，成立了调查委员会，研究和分析了肖洛霍夫的手稿。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九日，绥拉菲莫维奇、阿维尔巴赫、吉尔荣、法捷耶夫、斯塔夫斯基等拉普五位领导人在《真理报》发表公开信，为肖洛霍夫辩诬。这封信旗帜鲜明，态度肯定，措词强硬，起到了维护肖洛霍夫的作用，为他洗刷了名誉。然而这封信并没有起到一语定乾坤的作用，从那时到现在，剽窃说几起几伏，直到今天这种说法也没有彻底销声匿迹。

一九二九年春天谴责肖洛霍夫剽窃的风波还没有完全平息，第二次对他的攻击又开始了。当年秋天，顿河岸罗斯托夫边区共青团的《布尔什维克接班人报》第206号（1929年9月8日），刊登了尼古拉·普罗柯菲耶夫的《纯文学的创造者》一文，文章列举“事实”，谴责肖洛霍夫“脱离政治”，“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用自己家的小百叶窗”同社会生活隔离开来，不赞成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纵容富农，为富农的利益进行辩护，是富农和反苏分子的同谋。

这篇文章发表后，震动很大，肖洛霍夫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他立即赶到罗斯托夫，到边区委员会出版局和北高加索无产阶级协会，要求组织调查委员会，澄清事实，并谴责普罗柯菲耶夫。肖洛霍夫除要求组织出面调查外，自己于一九二九年在第10期的罗斯托夫杂志《高潮》上发表声明。肖洛霍夫的声明发表一个月以后，北高加索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书记处在一九二九年第11期《高潮》杂志上，发表了正式通告，题为《反对诽谤无产阶级作家》。

尽管如此，这种指控还是使肖洛霍夫很苦恼，我们从他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三日写给自己的朋友阿·布赛金的信中可以看到肖洛霍夫当时恶劣的心境，他说：

“我这一年是特大丰收的一年——春天没有来得及摆脱剽窃的罪责，那个谣言的闹声还没有平息下来，而目前却又来了另一个谣言……”

我讨厌这种生活，讨厌极了。我决定：假如还有哪个坏蛋掀起运动反对我，并且带着这种卑鄙的腔调，我就在报刊上发表声明：把你们所有的一切完完全全都摆出来，给你们两个月的时间。我等上两个月，以后再开始工作。否则你刚拿起笔，‘魔鬼’就立刻出现在你身边拷问你：‘你不是白卫军官吗？不是老太婆代你写的小说吗？你帮助富农吗？你忠于右倾吗？’结果，甚至会把像我一样的十分有教养的人，变成张口就骂娘的家伙和粗鲁汉，并且还会迫使他得上忧郁病。”

这种“魔鬼的拷问”，严重地影响了肖洛霍夫的情绪和创作，给他带来极大的苦闷和压抑。然而肖洛霍夫并未屈服，而是积极地展开了斗争，想方设法摆脱困境。他在处理完这件事之后，向维约申斯克党支部申请加入联共（布）党，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按照生活的鲜明足迹

在肖洛霍夫的人生道路上，一九三一年是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联共（布）党接受了肖洛霍夫的入党申请，老作家绥拉菲莫维奇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同年，高尔基还邀请肖洛霍夫去他那里作客。当时高尔基正在意大利索伦托养病，他很想亲自认识一下肖洛霍夫。高尔基的邀请是通过党中央转达的。肖洛霍夫接到邀请后非常高兴，他急忙赶到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斯大林接见了肖洛霍夫，同他进行了谈话，特别谈到了党的全盘农业集体化政策。这次斯大林的接见和谈话，使肖洛霍夫得到很多启示，唤起了他要实现新的创作构思的激情。他决心暂时放下《静静的顿河》的写作，他要写一部反映农业集体化的长篇小说。

肖洛霍夫带着这种高昂的情绪，在他的老朋友瓦西里·库达朔夫的陪同下，于一九三一年秋出国去会见高尔基。他们途经柏林，需要在那里等候意大利的入境签证。但是当时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政府迟迟不给肖洛霍夫签证。他在柏林等候了三个星期，他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缓慢，很想念祖国，渴望投入顿河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去，急切地想实现自己新的创作计划。于是决定放弃去意大利的机会，迅速启程回国了。

肖洛霍夫匆匆地回到了顿河，立即投身于农业集体化运动。他经常和纽约申斯克区委的同志一起到各个农庄去。有时早上讨论一下，当天做什么，到哪个农庄去，到哪个生产队去，然后马上行动。赶到那里立即召集会议，讨论农庄的工作，甚至有时就宿在农庄或生产队里。肖洛霍夫还经常参加集体农庄的收割工作、交公粮工作等等。他热情高，不怕困难，喜爱这种沸腾的生活。他像一团海绵一样竭力吸收着生活中的滋养，他把他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东西牢牢地记在心上，他将要把这一切，经过反复咀嚼，最后融会在自己未来的书中。他说：“善于艺术地反映这种生活的作家的书，是可以帮助建设共产主义的。应该让全国都知道党在农村的工作，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

肖洛霍夫不仅在田间劳动中，在集体农庄的会议上和人们交往，他还经常去哥萨克家访问、作客，哥萨克们也到他家里来。肖洛霍夫的院子里经常挤满了人，作家坐在台阶上和人们交谈。

肖洛霍夫生活在人们中间，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这些素材如何运用呢？如何扬弃和升华呢？他需要许多时间进行思考。

肖洛霍夫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很喜欢打猎。在写作《被开垦的处女地》期间，他也常常出去打猎。有时一大早背上猎枪出发，长时间在野外或林中漫步徘徊，不断思索，反复琢磨，不知错过多少开枪射击野禽的好机会。回到家已经中午了，他钻进书房，一直写作到很晚。

肖洛霍夫很快完成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第一部，迅速地反映了一九三一年顿河地区开始的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后来他曾经回忆说：“一九三一年，当发生在农村的、使农村彻底翻了身的那些事件——消灭富农阶级、全盘集体化、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群众运动等，还记忆犹新的时候，我按照生活的鲜明足迹写了《被开垦的处女地》。”

的确，书中充满了暴风雨般的阶级斗争的时代气息，令人强烈地感觉到一九三一年的顿河集体化时期的生活。同时，书中也反映了一九三一年在农

业集体化运动中出现的强迫命令的“左”的偏差。

正由于这部书描写了党在集体化运动中的某些政策上的偏差，所以《新世界》杂志编辑部不同意发表这部作品。

肖洛霍夫后来证实说，是由于斯大林的干预，作品才得以在《新世界》一九三二年一月至九月上发表。

“我不加渲染地描写了暴动前的严酷现实”

肖洛霍夫在发表《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同年，在《十月》杂志一至十月号上发表了《静静的顿河》第三部。这一部的发表经过了许多周折。

早在一九二八年肖洛霍夫就着手撰写《静静的顿河》第三部。一九二九年一月至三月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第三部的前十二章。一九三一年秋肖洛霍夫最终完成了第三部。第三部包括一九一八年四月末到一九一九年五月末十三个月期间的顿河国内战争事件。故事中心是叙述一九一九年春红军后方顿河上游的哥萨克暴动。这次暴动为肖洛霍夫亲眼所见，那时他十四岁，印象极为深刻。当然十四岁的少年的观察力和理解力是有限的。肖洛霍夫写作第三部时，不得不深入到参加暴动的哥萨克中间去搜集素材。暴动的参加者们多半不识字，他们谈了许多亲身经历的、有价值的情况。肖洛霍夫还到莫斯科和罗斯托夫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查阅大量原始资料，他对暴动的原因、时间、地区、规模都做了缜密的调查研究。

第三部第十二章以后的稿子送到《十月》杂志编辑部，编辑部审阅后，不同意肖洛霍夫关于一九一九年春哥萨克暴动的艺术构思，认为作者为哥萨克暴动进行辩护。法捷耶夫亲自写信给肖洛霍夫，要求他对第三部的许多地方进行修改。

当时审稿子的共十人，七个人属于编辑部，另三个人不属于编辑部，其中一人，据后来苏联评论家康·普里玛博士说，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部一位要人，他自认为相当了解文学，他同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过从甚密。他当面对肖洛霍夫说：“您的《静静的顿河》对白军说来会比我们更感到亲切！”肖洛霍夫当时理直气壮地回答：“不！您错了！我在《静静的顿河》里写的是维约申斯克暴动的真实情况。这里——特别复杂。但我的立场是无畏的！”

这十个审稿人要求作者删去十个不同意的地方，如果都照办的话，那么就要删去整个第三部的四分之三。肖洛霍夫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编辑部的看法。

一九三一年五月，肖洛霍夫深入读者中间听取关于第三部的意见。五月底，北高加索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在罗斯托夫组织文学晚会，会上肖洛霍夫朗读了第三部的一些章节，其中包括米哈伊尔·柯晒沃依俘虏彼得罗·麦列霍夫后枪毙他的情节。读后，听众热烈发表意见。

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各种各样的社会集团都喜欢《静静的顿河》呢？肖洛霍夫说：“我从读者来信中已经了解到这一点，我在考虑这个问题，努力寻找产生的根源。”他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静静的顿河》中没有一条明确的否定的线索，这是小资产阶级环境的影响，他说：“我清楚这一点，并努力同渗透到我身上的和平主义自发势力进行斗争。”与会者还提出，书中描写的是“白军对红军的斗争，而不是红军对白军的斗争。”肖洛霍夫说，“的确是那样”。但是他不认为这是本书的缺点，而只是写作中发生的

一种困难。还有一个困难是从来没有人写过维约申斯克暴动，因此完全可能有忽略的地方。他表示，他本人也不满意第三部的最后的部分，想要修改它。

肖洛霍夫虽然认为要做些修改，但在总的方面他却认为，他毫不粉饰地描写了一九一九年哥萨克暴动的实际情况。

肖洛霍夫为争取第三部早日发表，打电报给法捷耶夫，请法捷耶夫把第三部的打印稿转给高尔基审阅。

高尔基很快读完了第三部，于一九三一年六月三日写信给法捷耶夫说：“《静静的顿河》第三部是一部具有很高价值的作品，我看，它比第二部更有意义，比第二部写得好……肖洛霍夫非常有才能，他可以造就成为很优秀的苏联作家。”同时，高尔基在信中也指出作者写作上的缺点：“作者有时不能将自己的立场同书中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分开。”

一九三一年六月六日肖洛霍夫写信给高尔基，希望得到高尔基的支持。肖洛霍夫在信中叙述了哥萨克暴动的原因，他说：“发生暴动是由于对待中农哥萨克采取过火行为的结果。这种情况被在顿河地区的邓尼金的特使所利用，他们将不同时间的零散的小型暴乱事件变成为涉及所有人的有组织的行动。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以前实际上曾经是顿河苏维埃政权的支柱的外地人，这时绝大多数都站在暴动者一边厮杀，建立了他们的所谓‘外地人义勇队’，而且厮杀得比哥萨克暴动者更残酷，因而也就比哥萨克暴动者更出色。……我不加渲染地描写了暴动之前的严酷现实。”

第三部中描写的一九一九年红军后方顿河上游哥萨克暴动的一段历史，确实是苏联国内战争中的重大事件。这次暴动给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造成了极大的危险。

顿河地区的德国占领军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德国发生革命时撤回本国去镇压革命了。顿河军总司令克拉诺夫将军失去了国外武装的支持，又遭到红军的步步进逼，他的军队惊慌失措地撤退了。红军迅速进入顿河地区。红军对哥萨克士兵所做的宣传鼓动工作，也收到很好的效果。顿河的村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革命形势非常好。一九一九年遭受严重饥荒的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正等着从顿河地区运来粮食，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由于苏维埃政权执行了对哥萨克的过火政策，哥萨克以维约申斯克为中心发起了暴动，对苏维埃共和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给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发出电报：

“无论如何要全力以赴，尽快帮助我们歼灭哥萨克并收复罗斯托夫，哪怕为此会暂时削弱乌克兰西部的兵力，否则会有灭亡之虞。”

如果真实地反映这次暴动的前因、后果以及它的复杂过程，的确需要非凡的胆识，而要发表这样的作品，更非易事。何况审稿人当中又有国家政治保安总部的要员。批准发表第三部这件事，高尔基本人的力量也是有限的。于是他也请了斯大林来做客。

两年前斯大林就对《静静的顿河》的前两部作过评价。那是一九二九年的夏天，斯大林给费里克斯·康的信中说，一部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不是决定于个别的细节，而是决定于它的总的倾向，由此出发谈到了《静静的顿河》。他说：“当代名作家肖洛霍夫同志在他的《静静的顿河》中写了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对塞尔佐夫、波得捷尔珂夫、克里沃希雷科夫等人作了简直是错误的介绍，但难道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静静的顿河》是一本毫无用处的书，应该禁止销售吗？”

尽管斯大林指出书中的个别错误，但仍然肯定了《静静的顿河》，并称肖洛霍夫为名作家。这次高尔基把斯大林请到了他家里，同时也把肖洛霍夫请来。这是一九三一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当时肖洛霍夫并不知道高尔基请了斯大林，他迈进高尔基的客厅，见斯大林在座。他明白了，他们刚才谈到了他的长篇小说。肖洛霍夫在桌旁坐下，斯大林便同他谈起来。斯大林一个人说着，高尔基静坐一边，抽着烟。斯大林从《静静的顿河》第二部谈起，然后他问肖洛霍夫关于俄共（布）党顿河委员会的过火行为和一九一九年顿河上游革命军事法庭的过火作法的材料是从哪里来的。肖洛霍夫一一作了回答。斯大林全神贯注地听着，并且思考着。斯大林说：“有人认为，国外的白卫军分子读了《静静的顿河》的第三部后会觉得很舒服。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当时肖洛霍夫回答说：“对于白卫军来说，这种舒服真是太妙了！整个顿河和库班地区的白军全军覆没！”最后斯大林果断地说：“我们发表《静静的顿河》第三部。”

为人民的利益大声疾呼

三十年代初期，维约申斯克区的党组织的工作非常出色，其中肖洛霍夫也做出极大的努力。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区党组织的沸腾生活中。一九三一年的春天，他走遍了顿河地区的集体农庄，了解阻碍集体农庄前进的原因。作家曾在《真理报》上发表特写《沿着顿河右岸》，谈到了这一切。一九三一年维约申斯克区的秋收工作九月十五日完成，比别的区为早，秋翻地也比别的地区多。一九三二年的春耕又比别的区完成得早。一九三三年春天，边区播种（组织与促进）委员会责成维约申斯克区将一千吨种子拨给米列罗沃区集体农庄，三月十八日开始运输。由于天气变暖，道路变得泥泞难行，洼地和沟壑都积满了水，承担运输工作的许多马匹和牛都累伤了。

这次调拨工作需要二千辆大车，从运粮地到米列罗沃区最近的集体农庄为五六十公里。两个星期的运输过程中，损失了不少拉车的牲口。之后，还需要从维约申斯克区右岸的集体农庄调拨谷物，在这种情况下，将有两千头拉车的牲口在播种前全部不能使用，而全区不过只有三千头拉车的牲口。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维约申斯克区右岸农庄的播种工作，侵害了维约申斯克各集体农庄的利益，害得庄员没有牲口耕地，没有口粮度过春天。而边区指挥调拨工作的领导人却把一切责任推到诚实的维约申斯克区委人员和老百姓身上。

这件事使肖洛霍夫十分愤慨，他一方面上告斯大林、党中央，一方面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把情况写给了《真理报》。《真理报》于第二天以“本报特约记者”的名义全文发表。

党中央和斯大林了解情况后，向顿河派出了政府的调查委员会。同时斯大林打电报给肖洛霍夫，让他把维约申斯克粮食困难等情况报一个数字给他。肖洛霍夫回了电报。于是在一九三四年，政府给维约申斯克区调拨了五十万普特粮食、种子和食品，并推迟这个区的粮食收购工作。

肖洛霍夫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针对危害人民利益的事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

肖洛霍夫的社会工作范围日益扩大。一九三二年，在他的协助下，维约申斯克镇安装了电话、创办了一所师范学校。根据肖洛霍夫倡议，镇里还成

立了一个哥萨克剧团，并建立了剧院，积极开展文化活动。一九三五年肖洛霍夫被选入联共党维约申斯克区委员会，一九三七年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他的社会工作担子日益繁重。同年，肖洛霍夫作为苏联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法国和西班牙举行的第二次国际保卫文化大会，肖洛霍夫在会上被选为国际作家协会保卫和平委员会委员和协会主席团成员。

“作家应该直截了当地对读者说真话”

一九三五年肖洛霍夫去欧洲旅行，丰富了他的阅历，扩大了他的视野。回国后，他大量阅读国内战争的资料和文艺书籍，继续写作《静静的顿河》第四部。

《静静的顿河》第四部包括两卷，即第七卷和第八卷。第七卷描写南方前线进行的战役，情节从一九一九年五月到一九二一年三月，也就是到邓尼金残部被击溃，从诺沃罗西斯克坐船逃亡国外的时候为止。第七卷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新世界》杂志上刊载完毕。

从《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发表，已经过去十个年头，读者焦急地等待着最后一卷的发表，盼望着知道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结局。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小说已经写到最后几页了。在这时候作家安纳托里·卡列宁见到了肖洛霍夫，他后来著文回忆当时的情形。

肖洛霍夫一面望着顿河和草原，一面说：

“您不能让大家都满意。大家都希望有一个轻松的好结局。假如说，结局将是阴暗的呢？”说着肖洛霍夫转过身，用疑问的目光注视着交谈者。

“那么，到底麦列霍夫怎么样了？”

肖洛霍夫微笑地问道：

“您记得塔拉斯·布尔巴对自己的儿子安德烈说的话吗？‘我生了你，我也要打死你。’”

肖洛霍夫此时变得十分严肃，他敛容正色地继续说道：

“我只能说，结尾将使许许多多等待好结局的人上当。《静静的顿河》最后一卷一定会引起各种各样的见解和论断。然而，不应当忘记，作家应该直截了当地对读者说真话，无论这真话是多么的痛苦。评价一部艺术作品，首先要着眼于它的真实性和说服力。”

在写《静静的顿河》结尾的日子里，肖洛霍夫夜夜通宵达旦地独自和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厮守在一起。有谁知道，在这些维约申斯克的漫长冬夜里，作家曾经有过多少反反复复的思考啊！茫茫的夜色笼罩着全镇，就连东方天际升起的月亮也不能冲破四周的黑暗。可是，镇上只有肖洛霍夫的书房的窗子，闪烁着淡黄色的灯光。朝霞升起，窗内的灯光才熄灭。那时候，淡青色的浓雾渐渐腾起，灰色的、寒冷的黎明，悄悄地慢步从草原来到镇上。

这样一夜接一夜地过去，终于来到了最后的一个不眠的夜晚，肖洛霍夫随手在拿到的第一张纸上写道：

“葛利高里在许多失眠的夜里所幻想的那一点点希望总算是实现了。他站在自己家的大门口，手里抱着儿子……这就是在他的生活上所残留的全部东西，这就是使他暂时还能和大地，和整个这个巨大的、在冷冷的太阳下面闪闪发光的世界相联系着的東西。”

一九四一年《新世界》杂志第二三期合刊发表了《静静的顿河》第八卷。

立即在广大读者和文艺界引起热烈争论。大家多么愿意，大家多么期望，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这个哥萨克中的优秀分子，能够在经历了无数探索、犹豫、波折、反复、痛苦和血的洗礼之后，能跟随着布琼尼的骑兵队伍前进，在革命阵营中找到自己的归宿，然而……竟会这样出人意料。或许作家本人也没有想到，他和他的主人公相处十二年之后，却在这样的结局中分手。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走过的道路以及他的结局，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和存在的。作家没有回避现实生活中的任何矛盾与冲突，直书生活的全部真实。肖洛霍夫表现出一个真正现实主义作家的非凡的胆识。

文学界围绕着长篇小说主人公的结局，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开讨论会，在《文学报》上发表文章，在斯大林奖金委员会的会议上进行争议，等等。以各种形式展开的争论，一直进行了数月之久。

著名作家法捷耶夫和阿·托尔斯泰都曾经在斯大林奖金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过自己的意见，他们的看法是有很大大代表性的。法捷耶夫说：

“肖洛霍夫以其巨大的天才力量和对哥萨克生活、风习的深刻了解，表现了一个哥萨克家庭的历史，表现了反革命事业注定要失败。在小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反革命事业注定要彻底失败。然而，前途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代替它而诞生的事物是什么？这在小说中却没有。”

阿·托尔斯泰说：

“《静静的顿河》的这种结尾是一种有意义的构想、还是一个错误呢？我以为是一个错误……葛利高里不应该作为一个匪徒走出文学。”

然而评论家尤·鲁金却认为：葛利高里·麦列霍夫逐渐地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这部书并不因此而减少它的趣味和它的意义。因为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由一个经常表达全体中层哥萨克群众情绪的人到完全失去立足点的孤独的人，他的意义也随之扩大了，他走出一九二一年顿河哥萨克的环境并离开它的特征，扩展成为在革命年代找不到自己道路的人的典型形象。

围绕着《静静的顿河》尽管争论热烈，然而它毕竟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在苏联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获得了人们普遍的喜爱。它荣膺一九四一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

肖洛霍夫在前线

一九三九年三月，肖洛霍夫出席了联共（布）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发言表示：如果法西斯敌人进犯我们的祖国，我们苏联作家们一定投笔从戎，亲赴战场，保卫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发动了对苏的侵略战争。第二天肖洛霍夫在维约申斯克镇群众大会上发言，声讨法西斯敌人。七月份肖洛霍夫应征入伍，以团政委的名义担任军事记者，整个战争期间都在部队服役，直到战争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才复员。

一九四一年七月四日《真理报》发表了肖洛霍夫第一篇以战争为主题的特写《在顿河》，尔后，在七月三十一日《红军报》上又发表了特写《在哥萨克集体农庄里》。肖洛霍夫作为战地记者，在战斗的严峻年代里写了不少特写。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肖洛霍夫为纪念卫国战争一周年，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学会仇恨》。由此，肖洛霍夫转入长篇小说《他们

为祖国而战》的创作。

为什么肖洛霍夫再次转入长篇小说的创作呢？有一回在前线，肖洛霍夫接受一个任务，要他写一篇关于一个英勇牺牲的军官的下葬的报导，他用抒情的笔调和豪迈的气魄去写它，结果写的不像特写了，因此也就没有发表。这样，作家再次尖锐地感到自己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和特写作家，他的才能不在这方面。

但是，不管肖洛霍夫写报导也好，创作长篇小说也好，整个卫国战争期间，他都与苏联军队在一起，奔走在各个战场上，并且亲身参加过许多战役。

评论家列日涅夫曾经讲述过他于一九四一年九月在莫斯科碰见肖洛霍夫的情形。那时莫斯科遭到了德国轰炸机的空袭。《莫斯科》旅馆和它对面位于狩猎市场街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大厦都着上了保护色，一楼的窗子用木板遮住，窗子下面密密地、整齐地堆放着沙袋。街上失去了战前的热闹，很多妇女和儿童都疏散了，工厂也开始在疏散。莫斯科显得更宽阔了。它变得十分严峻，准备投入长期而顽强的战斗。青年们在首都周围的要冲挖着战壕。

就在这九月里的一天，列日涅夫在莫斯科旅馆高层的一个设备良好、但不通风的房间里见到了肖洛霍夫。作家外表的变化使列日涅夫一时感到很惊奇。这并不是由于肖洛霍夫穿上了军装。不是的。他和许多区委干部一样，平时也喜欢穿军装——穿军便服、马裤、长统靴。但是这次肖洛霍夫衣服笔挺，完全像军人那样整洁。看见这个熟悉的、今天格外精神的人，使列日涅夫很愉快。最引人注目的是沙发上的行军袋，它好像是战斗行军的证物。

尽管战争暂时失利，但肖洛霍夫却精神振奋，信心十足。他谈到顿河哥萨克的情绪，谈到战争初期的印象。他谈胜利就像谈一件虽然困难、但却早已决定了的事情一样。他一心一意想要赶到前线去。

列日涅夫问他：

“前线指挥部能像您现在想的这样，允许您钻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吗？”

“怎么会不允许呢？”肖洛霍夫的眼睛闪烁着愤慨的光芒。“战士们在作战，难道我只能在哪里、在司令部里瞭望吗？这样的话，现在和今后，我们胜利以后，我怎么去描写战争中的人民呢？！”

肖洛霍夫就这样怀着急切的心情，怀着爱国主义和责任感，走上前线。有一次，他沿着前沿阵地的战壕走去，不时地探头看看对面德国人的战壕。战士们爱护地让这位团政委小心，注意对面战壕里德国兵射来的子弹。肖洛霍夫笑着说，子弹打不着他，他会念“避弹咒”。战士们一下子就知道了，这位团政委原来是作家肖洛霍夫，因为大家都十分熟悉在《静静的顿河》里所描写的各种各样的避弹咒语。大家围上来，要求作家送给他们一套《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说，他非常愿意送给他们一套，可是他没有带在身边，他随身带着的只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于是他就把《战争与和平》签上名送给了这个连的战士。同时他还庄重地说，现在我们的咒语就是：保卫祖国，打败法西斯，取得胜利。

肖洛霍夫的赠书成为这个连的珍贵礼物，凡是战士新加入连队的时候，连里都要叙述这一段故事，鼓舞新战士英勇战斗。

肖洛霍夫在前线活动，前线指挥部和政治部领导人都非常爱护他，关心他，保护他，很怕他发生意外。

肖洛霍夫作为战地记者，在前线看到了人民的英勇奋战，也看到了人民的巨大牺牲和痛苦。肖洛霍夫自己就失去了许多同乡，失去了许多朋友。

一九四二年，肖洛霍夫一家在第一次撤退后回到了维约申斯克镇。恰巧肖洛霍夫也回到家乡。过了几天，哈尔科夫附近展开了战斗，维约申斯克镇也遭到敌机的疯狂轰炸。德国飞机大约每次二十架，从早到晚在镇的上空盘旋。大约五百幢房子被毁，全镇一片熊熊大火。

肖洛霍夫一家在七月十三日再次疏散撤退。作家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坐进汽车，但是作家的母亲阿娜斯塔西娅·达尼洛夫娜还在房子里面收拾东西。

肖洛霍夫下车到院子里去找她，母亲回答说：“你们先走，我再收拾收拾。”汽车开走了。等肖洛霍夫再回来接母亲的时候，他的家已经处在一片瓦砾与大火之中，房子中了好几颗炸弹。母亲被炸死了。母亲的死，使作家无限悲伤。

肖洛霍夫这次回家本来是来养伤的。不久前，因飞机出了故障，无法着陆，强行着陆后，机上一个箱子撞了肖洛霍夫的头引起脑震荡。没想到回到家里不久母亲便不幸牺牲了。

肖洛霍夫再次回到维约申斯克休假是在胜利前夕。那时他的脑震荡还没有痊愈，医生曾经要求他在克里姆林宫医院住院治疗，但是肖洛霍夫认为这毫无用处。他说：“我需要去打猎，打猎可以恢复健康，比住什么疗养院都好。但打猎时由于船小人多不小心掉到冰冷的河里。

前线的生活、战争期间的艰苦生活、脑震荡、以及这次打猎被淹，使肖洛霍夫的健康大大不如以前了。

关于战争的回味与思考

战争胜利了，战士从前线回到了被战争摧毁了的家园。到处是烧焦了的土地，到处是断壁残垣，几乎每一家都有亲人被战争夺去了生命。有的妻子失去了丈夫，有的孩子失去了父母。人们享受着胜利的喜悦，同时也怀着失去亲人的悲伤，以极大的毅力重建新的生活。

一九四六年三月，战后的第一个春天，冰雪初融，道路泥泞，少有的暖和天气。肖洛霍夫开着吉普车，行驶在寂静的草原上，他来到顿河渡口。他要在这里等候渡船。这时候一个中年男人，领着一个几岁的男孩子，从远处走来，他们也要在这里等候渡船。肖洛霍夫穿着战士的旧棉军装，这个男人就把作家误认为汽车司机了。这个男人自己在战争年代是运输兵，当过司机，所以见到“同行”格外亲切，更何况他们两个人又都是兵，都经历了卫国战争。

在等候渡船的时候，这个男人向肖洛霍夫讲述了自己艰难坎坷的一生。他在战争中失去一切亲人，现在这个小孩子也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他认他做自己的儿子，他们相依为命，重新走上了人生的旅途，去开拓未来的生活。

这个英勇坚强的男人的悲剧故事震撼了作家的心灵。肖洛霍夫虽然在战争中看见过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流血牺牲，但是这件事仍然使他久久不能平静。他回到维约申斯克区委，对同志们说，他一定要把这个男人的故事写出来。

可是肖洛霍夫没有马上执笔。他似乎在思考什么，他似乎在寻找什么。

十年过去了，当肖洛霍夫读了雷马克、海明威等人关于战争的作品以后，似有所感，他只用了二个星期的时间，身不离案地迅速写出了著名的短篇小说《人的命运》，（电影译《一个人的遭遇》）并把它发表在一九五六年除

夕和一九五七年元旦的《真理报》上。

小说发表后，海明威从大洋彼岸打电报来祝贺，表示自己的态度。海明威曾说过，他很喜欢俄国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家普希金、托尔斯泰等，而在苏联作家中他喜欢肖洛霍夫。可见他也在肖洛霍夫的作品中发现了某些与他共鸣的东西。

苏联读者非常欢迎这篇小说，纷纷写信给作者和《真理报》编辑部。其中有一封信，要求作者告诉他们，作品中的主人公索科洛夫和他认下的儿子凡尼亚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想帮助这一对父子。

苏联评论界也很推崇这篇小说，认为它为处理战争题材的艺术作品开辟了新的道路，指明了新的前景。在这之前卫国战争题材的文学多从战斗功勋的角度来反映战争生活，它的主人公们多是战场上的英雄。而肖洛霍夫的这一短篇则从战争带给人民的巨大灾难和心灵创伤的角度来描写英雄人物。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苏联士兵，战前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战后他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苏维埃人，他承受了战争的重负，表现出无比的坚毅。战后，他带着一颗受到重创的心灵，和自己认下的孤儿重新开始生活。

这是一篇通过主人公的痛苦回忆来描写战争的小说，在主人公讲述的过程中，时而插入作者的旁白。尤其是故事的结尾一段，更明显地表现了作者对战争的思考。他望着远去的一对父子的背影，却也不无茫然地思虑着受到战争危难的人类的未来。

创作《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

一九四七年秋季的一天，肖洛霍夫从斯大林格勒返回顿河，天色已经很晚，夜幕很快降临了。肖洛霍夫和他的汽车司机决定在一个集体农庄过夜。汽车开进村后，看见全村只有一处亮着灯光，汽车就开到这幢小房子门前。这时候从房里一瘸一拐地走出来一个老头儿，下了台阶问道：

“柯列斯尼先科，是你吗？”

当他看见是小汽车，很失望，因为他正焦急地等待着另一辆汽车。他严厉地盘问了来客以后，才邀请他们进屋，还拿出一罐子牛奶来。

“您还请我们吃夜宵，越富有也就越快乐。”肖洛霍夫说着，就和这位老头儿认识了，原来他是本地的农庄主席柯尔涅伊·瓦西里耶维奇。

“您当主席很久了吗？”肖洛霍夫问他。

“从四三年开始……我从前线受伤回来，很快就当了主席。”

“怎么你，老爹，也到过前线？”肖洛霍夫的汽车司机忍不住了问了一句。

但是，柯尔涅伊·瓦西里耶维奇认为妇女也可以做生产队长。这样他就当了步兵，上了前线。他克服了一切困难，在斯大林格勒打过仗，打到库尔斯克……打了一年仗，受了三次伤。

肖洛霍夫仔细地听着这个上了年纪人的讲述，他述说着他的许多生活经历和坎坷的战争生活。

战争年代和战后开头的几年，村中没有男人，柯尔涅伊·瓦西里耶维奇领着妇女和孩子们艰苦地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肖洛霍夫常常到农庄去拜访庄员，同他们交谈，同时构思着自己的《被

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

肖洛霍夫写作《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是在一九三一年，几乎是与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同时进行的。那个时代，要让像康德拉脱·梅谭尼可夫那样的中农加入集体农庄可不容易啊！“他是带着眼泪，带着血，好不容易才把那条跟私有财产、跟耕牛、跟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连接的脐带撕断的。”

如今离开一九三一年已经很遥远了。庄员们经历了战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经历了卫国战争。现在的柯尔涅伊·瓦西里耶维奇们，或许当年也曾处于梅谭尼可夫的境地。现在肖洛霍夫重新开始创作《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时代不能不给他以影响。

肖洛霍夫在战前为《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准备下的草稿和材料都在卫国战争中毁了，战后他重新开始写作。一九五四年，在报刊上开始发表第二部的一些篇章。一九五五年肖洛霍夫谈到第二部的构思时说：“现在我重新开始写第二部……因为我不再喜欢我在战前所写的了。”一九六二年第二部全书发表。

在小说的第一部中，作家“按照生活的鲜明足迹”，描写了消灭富农阶级、克服农民私有观念、实现农村所有制的巨大社会主义变革，反映了充满阶级斗争的暴风雨时代。小说第二部是作家在五十年代末完成的，事隔三十年，显然写的仍然是三年农业集体化时期的格列米雅其村，可是却着重反映了五十年代的时代精神了。

“战争是不能随便写的”

还是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斯大林把肖洛霍夫请到他那里，督促肖洛霍夫尽早完成他在一九四三年就已开始的反映卫国战争的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一九四六年加里宁也十分关心肖洛霍夫的这部小说的创作。肖洛霍夫紧张地写作着，同时到全国各地去采访，搜集有关资料。肖洛霍夫预计把《他们为祖国而战》写成三部。他写着第一部，同时为第二部搜集素材，第二部描写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斯大林格勒战役是苏联卫国战争上一次伟大的战役。这次战役表现了苏联红军的伟大英雄气概，成为卫国战争由退却转入进攻的转折点。肖洛霍夫到保卫过斯大林格勒的英雄部队去了解情况，还多次到斯大林格勒去。

斯大林格勒是一个英雄的城市，这里的每一幢房子、每一条街道都曾经经历过激烈的争夺，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流淌过英雄战士的鲜血。

斯大林格勒在战火中几乎完全被夷为平地。战争结束了，人民重新建设了自己的城市。来到这座城市参观的国内外游人，都要向新建的英雄墓献上花圈，表示自己对英雄的景仰和哀悼。步入市内，街道整齐、宽敞、清洁，两旁耸立着高楼，沿街种着一排排的树，城市的生活给人以幸福而宁静的感觉。这里你会突然看到这样一条街，抬眼望去，只见断垣残壁，弹痕累累，烧焦的房舍，倒塌的梁柱，弹壳遍地，顿然间你的心会沉下去，似乎又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这是斯大林格勒人民有意留下的一块地方，用以作为战争的永久的纪念。肖洛霍夫不止一次来到过战前的、战后的、重建的斯大林格勒，或许他也不止一次地凭吊过这卫国战争中的旧战场和那河岸上的红军英雄墓。

为了写作《他们为祖国而战》，凡是特别使人记忆起战争年代的地方，

作家总要去看看。肖洛霍夫在一九四八年还曾经到诺沃契尔卡斯克的葡萄种植园和葡萄酒酿造研究所去搜集过素材，有一些德国战俘在那里劳动。肖洛霍夫在葡萄种植园中长久地看这些德国战俘干活，看他们怎样认真而仔细地耕耘着俄国的土地。研究所人员亚·伊波塔卡科回忆说：肖洛霍夫看着这些战俘，他的眼神变得越来越忧郁。然后他毫不迟疑地走向葡萄酒酿造师斯·米·特卡钦科，请求给战俘们喝些葡萄酒。他的语气十分诚恳。研究所人员立即照办了。

肖洛霍夫为了写关于战争的长篇小说，同许多在卫国战争中当过兵的人交谈，也同现役军人保持着联系。伊萨·普列耶夫将军曾经请肖洛霍夫观看他们在北高加索进行的军事演习。

肖洛霍夫观看着军事演习，但他却正在紧张地思考着怎样真实地表现当年红军为祖国而战的情景。

肖洛霍夫谈到关于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的构思时说：“使我感兴趣的是参加过这次战争的普通人。我们的战士在卫国战争的岁月里表明自己是英雄。关于俄国士兵，关于他的英勇，关于他的苏沃洛夫般的品格已经举世皆知。但这次战争却从完全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我们战士的面貌。我就想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揭示苏联战士的这些新的品德。这些品德使他们在战争中显得无比崇高……”

这部长篇小说陆续发表了一些篇章，一九六九年最后发表了两个半印张的样子，至此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全部完成。

故事从战争前夕的和平生活开始，描写了小说主人公总艺师尼古拉·斯特列里佐夫的家庭戏剧。

战争突然爆发，尼古拉·斯特列里佐夫走上战场。卫国战争头一年，他所在的某师第三十八团在退却过程中进行着顽强的战斗。盛夏，这个团刚刚打完一场争夺战，只剩下了一百一十七人又继续撤退。经过连日来的激战和长途跋涉，战士们个个精疲力竭。这样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在退却中又被迫打了一场遭遇战。等他们奉命撤到顿河左岸返回师部时，只剩下二十七名战士了，其中还有五名伤员。军官全部牺牲，然而却保存了沾满硝烟、尘土和草原气息的光荣的军旗。

在这样情节简单的故事里，肖洛霍夫用他现实主义的笔触，深刻而真实地再现了战争第一年的艰苦环境，德国法西斯军队在坦克、大炮、轰炸机的配合下，以泰山压顶之势进攻匆匆撤退的苏联红军。然而红军战士们，在敌我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个个以非凡的毅力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奋起抵抗，多次打退了进攻的敌人。

肖洛霍夫塑造的战士形象，栩栩如生，虽然都同样勇敢，但又各有特点，虽然都同在一个战场上，但他们的身世和性格又各有千秋。肖洛霍夫善于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与变化、表现他们的理想、愿望和丰富的思想感情。他们都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然而确实确实是为祖国而战斗的战士，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完成着英雄业绩。

肖洛霍夫从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九日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已走过了六十年漫长的创作道路。六十年间他把自己的巨大而艰辛的劳动的辉煌成果都献给了人民。他希望他的书“能够帮助人们变得更好些，心灵更纯洁，唤起对人的爱，唤起为人类进步的理想而积极斗争的意向。”肖洛霍夫以他的优秀创作赢得了读者的热爱。在苏联当代作家中他拥有最多的读者，据苏联《图

书评》报导，截止一九八三年一月一日，肖洛霍夫的作品已先后用八十八种语言，出版了一千零八十次，总印数达九千七百四十四万九千册。肖洛霍夫曾经获得诺贝尔奖金。授奖证上写道：“授予米·亚·肖洛霍夫一九六五年度诺贝尔奖金，藉以赞赏他在描写俄国人民生活各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的艺术力量和正直品格。”

这位苏联当代伟大作家肖洛霍夫在重病之后，于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在罗斯托夫州维约申斯克镇逝世了。肖洛霍夫在亲身经历了、并深刻反映了新旧两个世界激烈搏斗的历史时期之后，离开了人间。他以他一生的辛勤劳动，以他高超的艺术创作，为今天的和未来的千千万万读者展示了旧思想、旧制度走向灭亡、新社会在痛苦中诞生的历史长卷，为世界留下了一代诗史。他的作品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实践经验。他长期在顿河的土地上生活和创作，今天他的遗骨也安葬在那里，顿河的流水将日夜向他细声倾诉生活在顿河的人民群众的思虑、欢乐和向往。他的创作也将如悠悠的顿河，长存人间，越千古而不废。愿顿河的沃土安息它的伟大歌者的灵魂！

主要作品介绍

肖洛霍夫的作品以小说最负盛名，虽然他也曾写过不少随笔、特写、小品文和散文，但是他的主要成就却在于他所创作的具有悲剧史诗艺术风格的小说。下面我们主要介绍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以及短篇小说《人的命运》。

《顿河故事》

《顿河故事》收入二十余篇短篇小说和一个中篇，是肖洛霍夫的早期作品，绝大部分创作于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之间。这些小说反映了顿河哥萨克在国内战争期间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初年的生活和斗争，情节富于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活泼。

《看瓜田的人》（1925）描写在激烈的国内战争当中家庭也成了流血斗争的战场。父亲阿尼西姆·彼特罗维奇被任命为本村战地法庭的警卫队长后非常高兴，他在吃饭的时候，警告他的长子菲多尔不要同庄稼佬来往，不要勾结布尔什维克，并扬言，明天就逮捕菲多尔的朋友们。菲多尔毅然决定离家出走，到顿河对岸找布尔什维克去。他让弟弟米嘉从父亲枕头底下偷来了马房的钥匙，牵出了小公马，临别时他对弟弟说：

“我去参加红军，我要为土地、为穷人去作战，为了让世界上人人平等。你还小，将来你会明白真理在谁一边。”菲多尔走后，父亲狠狠地毒打了米嘉一顿。

有一天，米嘉看见父亲正把一群衣裳褴褛、身体疲惫不堪的红军俘虏赶进仓库，父亲举起刀鞘向一个受伤的俘虏的脑袋敲了一下，他踉跄几步，扑倒在地上。米嘉看到了这一切，他非常同情这些俘虏，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痛恨父亲。从此他开始让母亲烤面包，他把面包送去给饥饿的红军俘虏吃。父亲知道这件事后，把母亲活活打死了。米嘉逃出家，在村里做了看瓜田的人。他白天在田地里走来走去，轰赶着白嘴鸦，夜里睡在瓜田旁边的小棚子

里。一天黎明时分，米嘉听到棚子附近有呻吟声，他走出棚子，看见当红军的哥哥菲多尔受伤倒在地上。原来菲多尔被俘后逃跑时，腿被子弹打穿了。米嘉把哥哥藏到自己的棚子里，用向日葵籽子和野草盖上。兄弟两人商量好，等到天一黑，把菲多尔的伤腿包扎好，他们就从林间小路绕到顿河边，游过顿河，到那真理所在的地方去。可是傍晚时候，父亲却骑马搜寻到了瓜田，走到米嘉面前问道：

“夜里菲多尔没有到你这里来过吗？”

“没有。”

“那么棚子旁边的血迹是哪儿来的？要是你隐藏菲多尔，我会把你连他一起捣成肉酱！”

父亲走进棚子，拉开堆着的野草和向日葵籽子，他看见了菲多尔的一只赤脚。父亲用手握住腰间的手枪，这时候米嘉抢先一步，抓起斧子，照父亲的后脑勺砍去。

米嘉和菲多尔用野草掩盖起父亲的尸体后就走了。天破晓的时候，他们过了顿河，清晰地听见附近大炮隆隆的响声。他们抬头看见，东方天际出现一抹红霞。

这篇故事反映了哥萨克家庭在国内战争的严酷年代里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的流血斗争。与这篇情节相类似的作品，在《顿河故事》中还有多篇，如《胎记》（1924）、《漩涡》（1925）、《希巴洛克的种》（1925）、《有家庭的人》（1925）、《粮食委员》（1925）、《蛀孔》（1926）等，这些作品都通过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的交锋体现出残酷的阶级斗争。

家庭伦理关系常常蒙着一层温情的轻纱，常常被人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带有一定超阶级的味道，文学作品也常常把父爱、母爱、兄弟爱、夫妻爱作为永恒的主题加以表现。然而肖洛霍夫却看到了，并且入木三分地表现了阶级斗争在这种复杂严峻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些关系的深刻影响。他通过对伦理关系中的尖锐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描写，深刻地反映了时代变革的急骤和严酷。

《顿河故事》中的另一类短篇小说，是描写新生活，描写革命给予人的深刻影响。这类故事的调子明朗，表现了肖洛霍夫的幽默和喜剧才能，其中有代表性的小说如《高尔察克、荨麻和别的》（1926）。

《高尔察克、荨麻和别的》描写革命改变了哥萨克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这篇小说用民间讲故事的方式，通过喜剧性的幽默明朗的调子，表现了哥萨克新的家庭关系的建立。小说主人公这样叙述道：

春天里，我们村子里来了个女同乡——娜斯嘉。她头发剪得短短的，还包着红头巾。她要把娘儿们召集拢来，叫她们也搞个组织。村主席斯吉施卡来找我，对我说：

“费多特，你把娜斯嘉送到乡里去吧。她有证明文件，应该到那边去搞妇女工作。”

我到草原上去找我那匹怀驹的拉车母马，把它捉住，并且劝它说：“傻东西，别踢了，你去拉的不是一般客人，而是妇女政权！”等我牵马回来的时候，我的老婆已经和娜斯嘉混熟了，她把我打她的事也对娜斯嘉说了。娜斯嘉一见到我就对我说：

“你干什么打老婆呀？”

“为了维持秩序。你不打，她就会变坏的。老婆好比马，不打不走。”

“别说老婆，就是马也是不可以打的！”她这样教训我。
我们动身了，我故意不带鞭子，马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

“走快点儿！”娜斯嘉说。

“既然不可以打马，怎么能走快呢？”后来，马干脆站着不走了，可把娜斯嘉气坏了，她骂我无赖。

我送娜斯嘉回来，一进家门就对老婆火了，她竟敢不听我指挥！我抢前一步，抓住她的头发。可是没想到，她从前胆子很小，连眼睛都不敢对我眨一眨，这次她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揪住我的胡子，用各种各样的外国话骂了起来，我从她手里挣脱出来，好像脱了一层皮。这一切都怪娜斯嘉这个短头发的妖怪。从那天起我和老婆就发生了内战，直打得鬼哭狼嚎，后来她带着东西搬到原来地主家的空马房里去住了。村子里的生活也完全颠倒过来了。我的邻居的老婆杜尼雅、村主席的老婆和小姨也都跑到我老婆那里去了，她们一共八个人一块儿过。可是剩下我们这几个哥萨克怎么办呢？又不会挤牛奶，又不会做饭，把家务事搞得一团糟，真想上吊。后来我们几个人商量，一块儿去把她们赶回家。大家说我的模样像白匪将军高尔察克，推我当指挥。我刚一推开门，斯吉施卡的老婆就举起炉叉喊道：

“你来干什么呀，吸血鬼？”

我好声好气地对她们说：

“娘儿们，别糊涂了！大赦……”

我还没说完话，她们就扑过来：

“你们欺负了我们一辈子，就像欺负牲口一样，打呀，骂呀，到如今你还要骂人，你自己才是‘大赦’，我们可是规规矩矩的女人！”

他们糟蹋我，把我推倒在地上，杜尼雅坐在我的头上，她们用荨麻秆子打了我一顿，害得我一星期都不能坐板凳。

第二天开了大会，作出决定：今后不许再打老婆，还得替她们妇女会耕种一公顷向日葵。她们才各自回家，而我却落了一个不光彩的绰号——高尔察克。

这篇小说用活泼、新鲜的艺术形式，表现了革命提高了妇女的觉悟，革命改变了哥萨克的家庭关系。

作家的喜剧才能和幽默风格，以及他的像讲民间故事一样的叙述方式，在《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顿河故事》里很少有复杂的性格和深刻的心理变化的描写，然而《野小鬼》（1925）和《人家的骨肉》（1926）在这方面是两篇较为优秀的作品。

这两篇小说描写革命的现实生活对一个孩子和一个老人的影响。《野小鬼》是描写苏维埃政权初建年代一个革命的家庭，爸爸是红海军，爷爷和妈妈是革命军人的家属，野小鬼米施卡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和美的家庭中。他刚七岁，活泼，可爱，天真。故事开始描写米施卡梦见爷爷说他偷了鸡蛋，把换来的钱坐转木马花掉了，因此要打他屁股，他吓得大叫一声惊醒了。醒来以后，先微微睁开左眼看看，看这是真事还是梦境。接着听见一个陌生的声音在叫：

“我的后裔在哪里呀？”

米施卡因为不懂什么叫“后裔”，害怕了，钻进了被窝。

“米施卡，你怎么还睡觉呀？你爸爸当差回来了！”妈妈嚷道。

米施卡还没有来得及眨动一下眼睛，那兵士已经一把把他抱起来，搂在

怀里，褐色的胡子重重地刺他的嘴唇、面颊和眼睛。米施卡忍着，忍着，可是终于像爷爷那样把眉头一皱，摆出严肃的样子：

“放手，爸爸！”

米施卡把爸爸回来的消息告诉了牧师的孩子维吉卡，还夸耀说：“我爸爸在战争中打过仗，可是你爸爸呢，是个吸血鬼，老吃人家的包子。”

“你爸爸是共产党！你一死……那边的小鬼就会把你放到油锅里去煎！”维吉卡幸灾乐祸地嚷着回答。

米施卡害怕了，大声说：“我去问爷爷，要是你胡说，你就别想再从我家的门口过。”

米施卡爬过篱笆，向家里跑去。看见一头猪被栅门夹住了，他跑过去救猪，骑到猪身上猛一用劲，推倒栅门，猪飞跑起来，跑到打谷场旁边他才跳下来。回头一看，见爷爷向他招手，他猜不透爷爷叫他做什么。

“爷爷，天上有小鬼吗？”

“我马上叫你去见小鬼！我用树条子抽你！你这小混蛋，为什么骑怀孕的母猪？”

爷爷不容分辩，解下皮带，把米施卡的头夹到自己两膝中间，打了他一顿。米施卡试着用脚踢爷爷，可是够不着。接着母亲抓住米施卡，把他推到屋里去。米施卡用拳头擦掉最后一滴眼泪，用屁股顶开门，溜到门外，用眼睛贴住门缝，留神看着爷爷的一举一动，接着威胁起爷爷来，他说道：

“哼，爷爷，你等着吧！等你牙齿掉光了，我不替你嚼东西！……到时候你别来求我！”

爸爸每天都给米施卡讲为穷人打仗的故事，讲列宁的故事。有一天夜里米施卡梦见了列宁。他高高的个儿，穿着红衬衫，让米施卡参加他的队伍。米施卡对列宁说：

“我要去为穷人打仗，万一爷爷因此拿树条打我，你可得来给我说个情啊！”

有一天村子附近出现了匪帮，爸爸和20多个人一块儿去打匪帮，爸爸牺牲了。夜晚，爷爷走进马房，牵出一匹马，弯下腰对着米施卡的耳朵悄悄地说：

“我老了，骑不上马，我把你放在马背上，你顺着山沟一直走，赶到普罗宁村去，那里有咱们的队伍，你告诉他们，咱们村子里有匪帮，叫他们来……”爷爷吻了吻米施卡，轻轻地拍了一下马。

这是一个明亮的月夜，鹤鹑愉快地叫着，溪水在山沟里淙淙地流着，夜风送来了凉意。米施卡一个人在草原上感到有些害怕，双手抱住马脖子，马加快了脚步。远远地看见了一点点浅黄色的灯光，听见了犬吠声，米施卡高兴起来。

“站住！骑马的是谁？……我要开枪了！……”

米施卡害怕地拉紧缰绳，可是马不服从他的指挥，向前冲去。风磨附近响起了枪声。米施卡的叫声淹没在一片马蹄声中。他骑的马用后脚竖立起来，接着便沉重地向右边倒去，米施卡感到腿上一阵难受的剧痛。

马蹄声近了，两个骑马的跑了过来，向米施卡弯下腰来。

“我的妈呀，原来是个孩子！……”

米施卡迷迷糊糊地低声说：

“村子里有匪徒……爸爸被打死了，执委会被烧掉了，爷爷叫你们快

去！”

这篇小说写得非常自然、流畅，孩子的诗意的天真和革命的激情合为一体，构成一种清新的、丰富的、具有无限魅力、使人永远向往的境界。

《人家的骨肉》描写迦夫里拉老爹从旧的立场转变到革命立场的复杂变化过程。迦夫里拉送儿子彼得罗去打红军，嘱咐儿子不要辱没了哥萨克军队和静静的顿河，要效忠沙皇。过了一个月，村里来了红军。迦夫里拉为了表示跟红军过不去，故意穿上哥萨克近卫军制服，还挂满各种因为忠君报国而获得的奖章和十字章。每逢星期日，就这样穿戴着到教堂去做礼拜，还故意敞开短大衣的前襟，好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村苏维埃主席有一次遇到他说：

“老大爷，把身上挂着的那些玩意儿拿掉吧！现在不时兴了。”

老爹一下子像火药那样爆炸了：“难道这些东西是你给我挂上的，现在又来叫我拿掉吗？”

老爹的儿子出征去打红军，一直没有消息。夜里，老爹常常听到老太婆的呜咽。他们一直盼望着儿子回来。迦夫里拉加工了几张羊皮，给儿子做了一件短大衣，还准备了一双靴子和一顶羊羔皮帽子。有一天，与彼得罗同团当差的普罗霍尔回来了，带来了彼得罗在侦察时被红军打死的消息。

儿子死后，两个老人过着寂寞和凄凉的日子，无心顾及村里的事。迦夫里拉也不去执委会参加村民大会了，因此对于余粮征集制的事一点也不知道。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村苏维埃主席带了三个扛着步枪的人到他家里，他很吃惊。主席开门见山对老爹说：

“老爹，你坦白地说，有粮食吗？”

“你以为我们是拿圣灵当饭吃吗？请问，我的粮食关你们什么事？”

高个子、淡黄头发的人说：

“余粮征集制。老爹，你听到过吗？”

“要是我不给呢？”迦夫里拉怒气冲冲地说。

“你不给吗？我们自己去拿……”

“拿去吧，该死的！你们抢吧！吃别人的东西会噎死的……”

这时院子外面传来一声粗野的叫喊：

“哪里有征粮员？……”

迦夫里拉回头，看见一个骑马的人从肩上拉下步枪，一声响亮的枪声，淡黄头发的人跌倒了，他的一只抖动的手还在摸索着手枪……院子里一片枪声。直到天黑，在山后面还在响着射击声。迦夫里拉老爹，在苍茫的暮色中，在栅门旁边看见中弹倒在矮墙上的苏维埃主席，在雪地上并排躺着三个征粮队员，从一块块凝结的血块上，已经冒出一股死人的臭味，——这简直像一场梦。迦夫里拉向淡黄色头发的人望了望，他还只是个十八九岁的男孩子。老爹伸手摸了摸他的胸膛，不禁吃了一惊，他的手感到一股微弱的温暖……老爹费力地把他拖进了屋里。

老爹和老太婆开始精心护理这个受重伤的征粮队员，他们把对儿子的爱都移到了他的身上。两个月过去了，征粮队员慢慢好了起来。老爹和老太婆就用儿子的名字彼得罗来称呼他。

“今天我要起来了，爸爸！”

迦夫里拉听到唤他爸爸，高兴地涨红了脸，喃喃地说：

“你躺了两个多月了……是时候了，彼嘉！”

“当时没有把粮食送去吗？”

“送去了……”

“干得好，爸爸！”

迦夫里拉听到“爸爸”两个字，心里又感到一阵温暖。

彼得罗是乌拉尔一个工厂的工人，他从小是孤儿，在工厂长大，参加了红军，后来又被派来做了征粮队员。他在老爹家养好了伤，开始帮助老爹在草原上耕地，耙土，播种。两个老人暗暗地存了一段心事，他们想把彼得罗留下来，给他娶亲，和他一块过日子。可是突然有一天，工厂给彼得罗来了一封信，说工厂已经开工，叫他回工厂去。

彼得罗接到信后，变瘦了，每天夜里唉声叹气，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迦夫里拉明白，草原留不住彼得罗了，工厂早晚要把他夺回去。彼得罗终于对老爹说：

“爸爸，我不能再呆下去了，我想回工厂……”

“我不留你。你去吧！”迦夫里拉鼓起勇气回答。“你得瞒过老太婆……你说，住一阵就回来。”

迦夫里拉一路上送彼得罗，东拉西扯地说着些不相干的话儿，借此掩饰他再一次失去儿子的凄苦茫然的心情。他觉得彼得罗一走，这儿连太阳也会暗淡无光。彼得罗在拐弯处最后一次挥了挥帽子，而在他迈步走去的地方，风猛烈地旋转着，扬起一片白蒙蒙的尘雾。

肖洛霍夫在这篇小说里，描写了一个哥萨克老头儿接受革命的自然而曲折的过程。迦夫里拉虽然是劳动农民，但是他是哥萨克，他保留着哥萨克在沙皇军队服役的光荣感，他看不起红军。接受新鲜事物是困难的，然而匪帮非常残酷地杀死了征粮队员，惊醒了迦夫里拉劳动者的善良的心灵。他看到了匪帮的这种残酷、这种违背人性的行为，是和劳动群众向往劳动的、宁静的、友好的、和平的、建设性的生活多么格格不入。因此他的爱子之心随之也赋予了社会的意义，他的转变也是自然的了。正像绥拉菲莫维奇指出的，肖洛霍夫善于从许多特征中挑出最典型的特征。

《顿河故事》已显露出肖洛霍夫善于描写悲剧的某些特点，同时也表现了肖洛霍夫独特的幽默感和喜剧才能。然而，这些生动的、别具一格的短篇小说，毕竟是肖洛霍夫的早期试笔之作，从中还常常可以看到，他在反映现实方面存在着一些过于简括和直线的地方。

《静静的顿河》

《静静的顿河》共四部八卷，从一九二六年开始创作，第一部发表于一九二八年，最后一部完成于一九四一年。这部宏伟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顿河边区人们的生活”，描写顿河哥萨克在两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和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的历史，揭示他们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这部书充分显露了肖洛霍夫作品的悲剧史诗的艺术风格。这部小说反映的社会现实生活广泛而深入。作家在揭示、挖掘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冲突时独具胆识，在创作中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敏锐、深刻、真实和充满激情。这部作品以其高超的艺术赢得了世界荣誉。

小说以哥萨克古歌开篇，仿佛把读者带进了顿河哥萨克从古至今的悲壮的生活历史的长河之中：

我们的光荣的土地不用犁铧耕耘……

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耘，
光荣的土地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
静静的顿河上装饰着守寡的青年妇人，
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
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滚。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是我们的父亲！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的水流为什么这样浑？
啊呀，我的水，怎么能不浑！
寒泉从我的河底向外奔流，
白色的鱼儿在我的中流乱滚。

静静顿河的南岸，鞑靼村的尽头，住着哥萨克麦列霍夫一家。老麦列霍夫·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的母亲是土耳其人，是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的父亲参加一八七八年俄土战争后带回来的。那年，正赶上村中闹畜瘟，大家纷纷传说是由于这个土耳其女人使妖法的缘故，于是哥萨克们就把她打死了。土耳其女人留下一个男孩，即潘苔莱，他长大之后，娶哥萨克姑娘为妻，生了两儿一女。如今他已进入晚景残年。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年轻的时候，参加沙皇阅兵典礼中的赛马活动，把左腿摔断了，现在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背略微有些驼，左耳朵上戴着一只半月形的银耳环，一直到老年，他的胡子和头发都是黑的，愤怒的时候常气得半死。这种情况使他的妻子伊莉妮奇娜提前衰老了。

大儿子彼得罗已经娶了亲，他的妻子姐丽亚给他生了一个孩子。彼得罗长得很像母亲，身材不高，麦色的头发，蒜头鼻子。小儿子葛利高里像父亲，他比哥哥小六岁，而个子却比哥哥高出半头。他像父亲一样，也长了一只下垂的鹰鼻子和一双略微发蓝的扁桃形的热情的眼睛，高颧骨，红棕色的皮肤，背也略微有些驼，笑起来，表情也像父亲一样粗野。父亲的爱女杜妮亚希珈是个大眼睛的姑娘。这些人就组成了麦列霍夫一家。

一九一二年五月一天的黎明，灰色天空闪烁着稀疏的晨星，麦列霍夫家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第一个醒来。他把牲口放到街上。姐丽亚穿着衬衣跑去挤牛奶，院子里长满露水的草地上留下她一行隐约可见的脚印。睡得胡里胡涂的葛利高里走进马棚，他照例要牵马去顿河饮马。

葛利高里骑到马背上，马一溜烟地向顿河跑去，扬起满天尘土。这时候麦列霍夫家的邻居，哥萨克斯切潘·阿斯塔霍夫的妻子婀克西妮亚，从坡上挑着水桶走下来，大声喊道：

“ 疯鬼！差一点叫马踩着我，我去告诉你爹，就说你像疯子一样骑马。 ”

“ 好好，女街坊，别骂啦。你把男人送去入营以后，你家里也许还用得着我呢。 ”

“ 我一点儿也用不着你！ ”

“ 等割起庄稼来，你就会来求我啦。 ” 葛利高里哈哈大笑说。

葛利高里很喜欢婀克西妮亚。

彼得罗在台阶上跟家里人道别，他和斯切潘·阿斯塔霍夫，以及同村的几个哥萨克一同去入营。葛利高里隔着篱笆看见，婀克西妮亚正给斯切潘牵马，斯切潘微笑着，亲着自己的妻子，然后踏上马镫。婀克西妮亚抓住一只马镫，并排走着，并恋恋不舍地看着他的脸。

婀克西妮亚十七岁的时候嫁给了斯切潘·阿斯塔霍夫。斯切潘是个不很安分守己的哥萨克，婚后第二天就把年轻的妻子打了一顿。他经常去外面喝酒和胡混，把婀克西妮亚一个人关在仓房或内室里。婚后的头几年，他总是这样欺侮她。她对丈夫也没有感情，有的只是妇女的同情心。

当葛利高里执拗地、满怀希望地爱上她的时候，她感到这个可爱的小伙子正在吸引着她，她在理智上尽量地抵抗着，但却不由地感到又温暖又愉快。早晨挤牛奶的时候，她常常微笑着，心里想：“如今真快活。葛利高里……葛利沙……”这种感情使她胆战心惊，好像三月里踏着已开始融化的冰层穿过顿河一样。

斯切潘入营以后，她决心尽量减少和葛利高里见面的机会。

一天傍晚，雷雨交加，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带着葛利高里和杜妮亚希珈，又叫上邻居婀克西妮亚和另一个女人，五个人一块儿去顿河捕鱼。回家的路上，葛利高里再次向婀克西妮亚表述自己的爱情。婀克西妮亚决心摆脱葛利高里的纠缠。

圣灵降临节那一天，全村都开始割草了。麦列霍夫家叫着婀克西妮亚一块儿去，同时也帮着她家割草。

割草的男人和耙草的女人都穿得像过节一样。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习惯。

麦列霍夫家的人坐着牛车出发去割草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有半个村子的人都在草地上上了。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对着远处一座钟楼的白色尖顶画了一个十字，拿起一把镰刀，割下第一刀。葛利高里跟在他后面割草。

就在这次割草期间，婀克西妮亚接受了葛利高里的爱情。不久流言蜚语传到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的耳朵里了。他攥着拳头，一瘸一拐地去找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显得年轻了的婀克西妮亚。他一进门就叫喊道：

“你这是干什么？……我要为了这件事把葛利希加揍出血来，还要给你的斯切潘写信……把你打得还是太少啦！从今天起不许你踏进我的院子！”

婀克西妮亚眯着眼睛听着。她忽然向他走去。

“你是我的公公吗？啊？你为什么教训我？打这儿滚出去！至于葛利希加，他是我的人，现在他是我的，将来也是我的！为了我整个的痛苦的生活，我非爱不可！你们杀死我我也不怕！”他被婀克西妮亚撵了出来，只好去找儿子葛利高里：

“别侮辱街坊！别叫你老子丢人！我要把你送到村民会上去揍死你……我要给你娶个傻丫头！……”

不久，果然给葛利高里说亲了。新娘是珂尔叔诺夫家的长女娜塔莉亚。

珂尔叔诺夫家是鞑靼村的首富。他家有十四对公牛，十五只母牛，一群马，几百只羊。房子不比商人莫霍夫家的坏。有花园，还有一片树林子。

相亲那天，娜塔莉亚的父亲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微笑着把她叫了出来。她戴着黑色的针织头巾，两只灰色的勇敢的眼睛，脸蛋上一个小酒窝，一双会劳动的大手。葛利高里仔细打量着她，心里颇为冷淡。

相亲后，娜塔莉亚爱上了葛利高里。她父亲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心里很喜欢葛利高里的那种哥萨克式的英勇，喜欢他那种热爱劳动的劲头。但是要把自己的长女嫁给这样一个名誉很坏的穷小子，又觉得太委屈了。

两家商量之后，还是决定给他们完婚。

娶亲的日子终于来到了。麦列霍夫家套了四辆双套大车，去迎娶新娘子。男宾相是哥哥彼得罗。

麦列霍夫家娶亲的四辆大车从家里出发，争先恐后地顺着街道飞跑起来。马匹都披着大红的、天蓝的和浅粉色的马衣，马鬃和额鬃上都戴着纸花和缎结，拴着许多铃铛。

四辆车轰隆轰隆地赶进新娘家的院子。彼得罗领葛利高里走上台阶，一同来的参加迎亲仪式的人都跟在他们后面。

从门洞通到厨房的门关着。彼得罗敲了敲门。

“主耶稣基督，宽恕我们吧。”

“阿门，”门里面答应了一声。

彼得罗又敲门，把话重复说了三遍，里面才低声地答应他。

“能让我们进去吗？”

“欢迎，欢迎。”

门开了。女媒人一面鞠躬，一面微笑着迎接彼得罗。

“请喝一杯吧，宾相，为了您的健康。”

她递过来一杯克瓦斯。

按照规矩，这位媒人又向新郎的家族敬了三杯白酒。

娜塔莉亚已经穿好结婚礼服，戴上了面纱，许多人围着她。她的两个妹妹，一个拿着擀面杖，一个拿着播种用的筛子。彼得罗给她们端来一杯酒，里面放着一枚五角的硬币。女媒人向她们挤挤眼。小姑娘就用擀面杖往桌子上一敲：

“太少！我们不能卖新娘！……”

彼得罗又添了一些小银币。

“不卖！”

“让开吧，姑娘，”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笑着命令说。彼得罗把手绢的一头塞到葛利高里手里，把他领到坐在圣像下的新娘面前。娜塔莉亚握住了手绢的另一头。

被婚礼弄得胡里胡涂的葛利高里，怀着一种冷淡的失望的心情，低声地自言自语地咒骂着。

等到迎亲的马车回列麦列霍夫家时，老人们都出来迎接。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拿着圣像，伊莉妮奇娜站在旁边。葛利高里和娜塔莉亚走过来接受祝福。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一面给他们祝福，一面流下眼泪来。

一点钟以后，葛利高里和娜塔莉亚在教堂里举行了结婚仪式。

珂尔叔诺夫家的人在新郎和新娘到教堂去以后才来。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一面从瓶子里斟着酒，一面流出了眼泪。

“唉，亲家，为了咱们的孩子喝一杯吧。希望他们诸事如意，情投意合……”

鞑靼村的商人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莫霍夫的先祖，是在彼得大帝时代遵照沙皇的命令，从沃罗涅什来到顿河作坐探和眼线的。每年两次，他要向当局报告哥萨克是否安分、是否准备叛乱等情况。

莫霍夫家的家业几经沉浮，到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手里，靠欺骗和剥削附近各村的哥萨克，大大地兴旺起来了。他在镇上开了一个杂货铺，后来又陆续开了一个布店、一个粮栈和一个机器磨坊。鞑靼村和附近的村庄，没有哪一家不欠莫霍夫的债的。

莫霍夫的第一个妻子早逝，留下一儿一女。女儿伊丽莎白已经中学毕业，是一个一意孤行的美丽而放荡的姑娘。莫霍夫的儿子弗拉吉米尔，是一个瘦弱的、脸色黄黄的小伙子，中学五年级学生。他假期无事总要去磨坊转转，看看工人怎样干活儿。碾面工人达维德加和他开了个玩笑，说他爸爸是个守财奴。他走去告诉了他爸爸，于是达维德加就被开除了。磨坊的磅秤工人，绰号叫“丁钩儿”，对老板这样欺压工人非常愤慨，他对达维德加说：

“很快就要把他们的血管割断啦。对付他们，一次革命当然太少。要叫他们尝尝一九一五年的滋味，到那时候咱们就能报仇啦！”

莫霍夫家的店铺和磨坊生意很兴旺，这里总挤满了哥萨克和外地人，他们选购东西，聊天，磨面。

圣母节的前三天，哥萨克和外地人在磨坊排队磨面的时候，打起架来。哥萨克和外来户的殴斗是很早就留传下来的。

这时候，一个戴着黑色呢帽的陌生人，飞快地走来，举起一只手，说道：

“请等一等！各位老乡！……”

“秃尾巴狗才是你的老乡哩！……”

那人向阿丰加·奥捷洛夫问道：

“你是什么人？”

“我是哥萨克，那你是什么人，是茨冈人吧？”

“不是，咱们都是俄罗斯人。”

“胡说八道！”阿丰加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哥萨克都是俄罗斯族出身的。你知道这件事吗？”

“但是我要告诉你，哥萨克是哥萨克的祖先传下来的。”

“古时候，有些农奴从地主那里逃跑了，他们移到顿河沿岸落了户，就管他们叫哥萨克。”

“坏蛋才是移来的呢！……他把咱们变成庄稼佬啦！”

“这是什么人？阿法纳西！”

“是一个新搬来的人，住在斜眼卢凯希卡家啦。”

这个人就是从别的地方刚刚迁到鞑靼村来的铁匠施托克曼·约瑟夫·达维多维奇。从这一次事件开始，哥萨克认识了施托克曼。他们天天晚上去他那里打牌。

起初他们玩牌，后来不知怎么一来，施托克曼神不知鬼不晓地就拿出来了一本涅克拉索夫的小书，大家念起来，接着又拿了一本讲顿河哥萨克历史的小册子，米哈伊尔·珂晒沃依给大家念了三个晚上。小册子讲到顿河地区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斯切潘·拉辛、康特拉琪·布拉文，讲到自由的生活，一直讲到近代，讲述哥萨克的贫困生活，嘲笑沙皇对哥萨克的统治，讽刺各种制度和统治方法，说哥萨克集团就是沙皇雇佣的王位保护人。大家听后都很激动。

在卢凯希卡家的小屋里，经过了长期的淘汰与挑选，组成了一个有十个哥萨克参加的核心小组。由布尔什维克党派来的施托克曼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向他们灌输一些简单的革命道理，使他们对现存制度发生厌恶和憎恨。

冬去春来，农活儿忙起来，吃苦耐劳的娜塔莉亚嫁到麦列霍夫家以后，得到了公婆的喜爱。

葛利高里对新婚生活渐渐有点习惯了，可是过了三个星期，忽然感到心

里很痛苦，他忘不掉婀克西妮亚。在耕地的一个晚上，他和妻子睡在草原上，他很伤感地对娜塔莉亚说：

“你简直像一个陌生人……你就像这个月亮一样：既不冷又不热。我不爱你，娜塔莉亚，你不要生气。我本来不愿意说这些，可是不成，很明白，这样过下去是不成的……我很可怜你，这些日子咱们好像亲近了一点儿，可是心里依然什么也感觉不到……空虚，就好像现在的草原一样……”

娜塔莉亚抬起眼睛，望着那高不可攀的星空，她什么也没有说。

十二月里的一个星期日，葛利高里去镇上参加青年哥萨克的宣誓仪式，回到家来，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气得嘴唇哆嗦着，对他说：

“娜塔莉亚要走啦，这是为的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我知道。你要是不愿意和娜塔莉亚同住，你就给我从家里滚出去！”

葛利高里一气之下从家里逃出来，他带着婀克西妮亚来到亚果得诺叶，在地主李斯特尼次基老将军的庄园里做佣人。

老将军一人鳏居在家。他的四千亩土地还是他的曾祖父参加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分到的。他的儿子叶夫根尼·李斯特尼次基中尉在近卫军阿塔曼斯基团服务。老将军一个人在庄园里悠闲地打发着日子。冬天和秋天带着猎狗去打猎。有时候一个人关在客厅里，大喝上一星期。

庄园的佣人有侍候老爷吃饭的云尼阿民，女厨子鲁凯莉亚，衰老的马夫萨希加，牛倌琪洪和新上工的马车夫葛利高里，以及擦地板、喂家禽的婀克西妮亚。

娜塔莉亚自从葛利高里从家中走后，回到娘家，但她仍然在痛苦地等待着葛利高里回来。她原谅他，她不相信葛利高里会永远走掉。她决定写一封信给葛利高里，探听一下他是永远离开了呢，还是有回心转意的可能。她写好了信，派家里的一个长工送去。葛利高里在一张纸片上给她写了一封回信：“你一个人过下去吧。麦列霍夫·葛利高里”

娜塔莉亚读完回信好像不相信自己还有力量支持下去，她急忙躺到床上，轻微地哆嗦着。

第二天早晨娜塔莉亚用两只视而不见的眼睛打量着箱子里的一堆衣服，小心地抽出一条绿裙子。结婚前，有一回葛利高里来拜访她，在板棚的阴凉下面头一次很快地亲了她一下，使她很害羞，那时候她穿的就是这条裙子。她想到这些，突然哭起来。她竭力使自己的心镇定下来。她把葛利高里写的那张纸片藏在怀里，穿好衣服去教堂。一群青年挡住了她的路，说长道短使她难堪，姑娘们都吃吃地笑着。娜塔莉亚像醉汉一样跑回了家，走进板房。她没有想什么，也没有什么感觉，只怀着一种不祥的痛苦，这痛苦刺激着她那受辱和失望的心。她握住镰刀，向自己的喉咙……胸口压下去……

葛利高里和婀克西妮亚在亚果得诺叶过着安稳的日子。夏天的时候，婀克西妮亚生了一个女儿。自从生孩子以后，她露出一一种非常幸福的神态。葛利高里的活儿也不重，赶马车，割草，偶尔送老地主去镇上一次。……只有一件事使他放心不下，就是马上要服兵役，他既没有马，又没有装备。

还是在六月里，彼得罗曾经来看望过弟弟，他说爸爸仍然很生气，声明不给他预备战马。葛利高里为了买战马，把他和婀克西妮亚的工钱攒起来，连烟也戒了。

转眼之间到了十二月，葛利高里接到通知，要他在圣诞节的第二天到征兵站去报到。他还收到了发给他买战马的一百卢布，他加上攒的工钱，花一百四十卢布买了一匹马。

在圣诞节前一个星期，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亲自到亚果得诺叶来了，给葛利高里送来了一副马鞍和其他入伍需要的衣服装备。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还准备亲自送葛利高里入伍。

入伍的前一天晚上，葛利高里和婀克西妮亚都睡得很晚，婀克西妮亚一边哭着，一边低声对葛利高里说：

“葛利沙，你想想吧，要去四年呀！”

“据说，古时候要当二十五年兵呢。”

“入伍真该死，是拆散家人的魔鬼！”

第二天一清早，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套好了爬犁，葛利高里告别了婀克西妮亚，骑上战马，和父亲一同出发了。次日傍晚他们到达曼珂沃村征兵站。

娜塔莉亚自杀没有死，她恢复了健康，但脖子歪了。一九一四年三月，在一个日丽风和的日子，她回到婆家，一家人殷勤亲切地欢迎她，葛利高里的妹妹杜妮亚希珈对娜塔莉亚热情关心，老人们对她异常慈爱，只有嫂子妲丽亚对这一切常常给予白眼。

娜塔莉亚一天比一天更加殷切地盼望丈夫回来，她的颓丧的精神全寄托在这种希望上。她没有给葛利高里写过一封信，但是全家上下没有谁比她更盼望来信了。

娜塔莉亚从不到村里游戏场去，但是很喜欢听杜妮亚希珈讲一些天真的故事。杜妮亚希珈已经不知不觉地长成一个身材匀称而美丽的姑娘了。这一年她过了十五岁，年纪稍大些的女伴接受她加入姑娘的集团。她长得像父亲，短身材，脸色很黑，黑色的扁桃形的眼睛闪闪发光，白眼珠像蓝玛瑙一样。她从游戏场回来，就把自己的秘密讲给娜塔莉亚一个人听。

“娜塔莎，好嫂子，我想告诉你几句话……”“好，说吧！”

“米希卡·珂晒沃依昨天和我在公粮旁边的橡树上坐了一晚上。他说：‘你真像一朵蓝色的小花！’……”

“是吗？”娜塔莉亚鼓励着说，也为别人的快乐而感到高兴，忘记了自己的不幸。

“但是我对他说：‘别瞎说，米希卡！’于是他发起誓来啦。”杜妮亚希珈的笑声像银铃一样响遍了整个屋子。

这一年的夏天，猫头鹰每夜都在钟楼上和公墓上叫，恐怖的叫声在村子上空回荡。

“要糟糕啦，”老人们一听见猫头鹰的叫声，就预言说。

“要打仗啦。”

“在土耳其战争以前，也这样叫过。”

葛利高里所在的第十二团第四连的生活寂寞无聊，一天天昏昏沉沉地过去。夜晚梦见家乡，白天上操，挨长官的皮鞭。麦子已经成熟了，正等着哥萨克下地去收割。可是有帝俄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一列列满载着哥萨克的军用火车向前奔驰着，一路上留下了哥萨克的歌声。葛利高里所在的连队也出发了。

他们开进位于前线的一座市镇，穿过市街走上山岗，看见城市附近的战

壕里聚集着许多敌人。

上尉从刀鞘里抽出马刀，下令出发。

马匹疯狂地奔跑起来，连队发出惊天动地的呼喊声，离得很远就能听见噼噼啪啪的枪声。一颗颗子弹嗖嗖响着划破天空。葛利高里把烫手的长矛柄夹在肋下，思想受到恐怖的压抑，乱成一团。

一个身材高大的、白眉毛的奥地利人，跪在战壕里，差不多是对准葛利高里放了一枪。葛利高里挺起长矛，用力刺进奥地利人的身体。

另一个奥地利人，连步枪都丢掉了，吓得昏头昏脑，顺着花园的铁栅栏跑着。葛利高里被一种遍布周围的疯狂气氛燃烧着，他举起马刀，一刀砍进奥地利人的太阳穴，血像小河一样，顺着制服流下来。

葛利高里从这次战役以后，眼看着瘦下去，一种沉重的痛苦折磨着他，他在梦中总看见那个被他在栅栏旁边砍死的奥地利人。

八月底，团队从火线上撤下来，准备休整三天，并且要由顿河开来的援军加以补充。葛利高里的哥哥彼得罗来了，米哈伊尔·珂晒沃依、婀克西妮亚的丈夫斯切潘·阿斯塔霍夫等鞑靼村的哥萨克都来了。葛利高里和哥哥匆匆见了一面。

葛利高里在全部行军的日子，一直想忘掉自己的痛苦，恢复原来的平静心情，可是办不到。在新调到他们连队来的哥萨克当中，葛利高里认识了一个叫乌留宾的哥萨克，他的绰号叫“锅圈儿”。他教给葛利高里巴克兰诺夫式劈刺法。这是一种很厉害的劈刺法，一刀砍下去，连马都能砍成两截。他看见葛利高里的痛苦样子，教导他说：

“你不要去想这是怎么回事和为了什么。你是哥萨克，你的天职——就是不问青红皂白地砍下去，打仗的时候杀人，这是神圣的天职。”

葛利高里愤恨地说：

“你的心是狼心，也许什么也没有，只把一块小石头当做心放进去啦。”

“也许是对的，”锅圈儿很得意地同意了这个意见。

不久，因为锅圈儿打死了一个俘虏，葛利高里就和他发生了冲突。

八月上旬，叶夫根尼·李斯特尼次基中尉请求从近卫军阿塔曼斯基团调到哥萨克战斗部队。在这里他认识了志愿兵彭楚克。他们一块去执行侦察任务。

“贵镇在什么地方？”李斯特尼次基打量着志愿兵的侧影，问道。

“是诺沃契尔卡斯克镇。”

“您为什么当志愿兵呢？”

“我很喜欢战争艺术，我想掌握这种艺术。”彭楚克略微带着嘲笑的气氛回答，用锐利的绿眼睛看了看中尉。他的眼神显得很坚定。

李斯特尼次基琢磨不透像雾一样笼罩在这个志愿兵身上的某种神秘东西。

葛利高里在一次攻城战斗中脑袋受伤失去了知觉。等他苏醒过来，便感到头上的伤口疼得好像是放了一块火炭。他爬起来又栽倒下去，爬了好久才摇晃着站起来，看着北斗星的方向，缓步走去。路上，他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还救起了一个中校军官。为此，上级把他提升为上等兵，并授予四级乔治十字章。可是不久，他的眼睛又在敌机轰炸时受伤，他住进了莫斯科斯涅基列夫医生的眼科医院。

眼科医院里住着一个伤兵叫贾兰沙，是个机枪手。他的床挨着葛利高里

的床。几天的工夫他们就熟了。贾兰沙给葛利高里解释为什么打仗。贾兰沙经常把葛利高里不懂的真理灌输给他，揭露战争的真正原因，恶狠狠地嘲笑专制政体。葛利高里恐怖地意识到贾兰沙逐渐破坏了他以前的关于沙皇、祖国和他的哥萨克军人天职的全部信念。

葛利高里痊愈出院，回到了亚果得诺叶。他在重返部队之前有一段假期，回家来探望婀克西妮亚。他悄悄地跳过板栅子，走进马棚。来到老马夫的床前：

“萨希加爷爷，你没睡吗？”

萨希加爷爷披上一件棉袄走到院子里来了。

“老天爷呀！是葛利希加！他妈的你是打哪儿滚出来的呀？真是一个稀客！”

他们拥抱过，萨希加看着葛利高里的眼睛说道：

“进来，有话对你说。”

原来，葛利高里入伍后很少写信回来，婀克西妮亚在女儿死后非常痛苦，叶夫根尼·李斯特尼次基乘机而入，以安慰婀克西妮亚为借口占有了她。

葛利高里回到自己的屋里，婀克西妮亚带着非常慌张的神情点上了灯，她变得出奇的漂亮。她趴在葛利高里的膝盖上哭了半天。葛利高里很快就入睡了。

第二天早晨，葛利高里穿上军大衣给叶夫根尼·李斯特尼次基赶车。他把车赶到第一个洼地里，便抽出坐垫底下的鞭子，向中尉抽去。中尉被打得在地上滚来滚去，葛利高里用钉着铁后跟的皮靴子拚命地踢他，直打得精疲力尽，葛利高里才坐上马车飞跑回来，他跑进下房，又用鞭子抽打婀克西妮亚的脸。

尔后葛利高里就离开了庄园。

他大踏步走进了鞑靼村，迎面走来的妇女们都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从台阶上瘸着走下来，屋里是母亲的响亮的哭声，娜塔莉亚面色苍白，很痛苦地笑着，她被葛利高里的目光一扫就跌倒了。

晚上，老头子知道葛利高里和妻子和好了，画了一个十字，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一九一六年十月，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几个哥萨克军官，包括李斯特尼次基和地下工作者彭楚克，在潮湿的土室里热烈地争论着。彭楚克主张推翻专制政体，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彭楚克！”克勒梅珂夫叫了一声。“你们推翻帝制，成立什么衙门呢？是什么样的政权呢？”

“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知识分子和农民担任什么角色呢？”

“农民跟着我们走，一部分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但是其余的……我们对于其余的人就这么干一家伙……”彭楚克用一种迅速的手势摆动了一下。

彭楚克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登有列宁的文章《第二国际的破产》的报纸念起来。念完他就从土室走出去了。

第二天彭楚克失踪了。同时在机关枪连的战壕里出现了传单。团长命令搜查这个连，拆散这个连，把士兵分散到别的团队里去。

这样做，正是彭楚克所要达到的目的，他希望把他所在连队的机枪手分

散开，以扩大革命的影响。

战争已经到了第三个年头，士兵都厌战了。战争甚至改变了与葛利高里同在第十二团的锅圈儿的观点。他坚决地、而且固执地走到反对战争这一方面来了。有一天葛利高里把贾兰沙的话告诉了他，可是他却不赞同。他说：

“咱们哥萨克需要的是自己的政权，不是别人的政权。咱们和庄稼佬走的不是一条路。庄稼佬是想乘机抢夺土地，工人是想给自己增加工资，他们能给咱们什么东西呢？”

葛利高里听了以后，皱着眉头说：“你总是只想到一个方面。”

夜间，葛利高里独自回忆着往事，想起了婀克西妮亚和娜塔莉亚，想起了出院后在家里度过的那几个星期。家里人和同村人都非常尊敬他，欢迎这位第一个获得乔治勋章的人。葛利高里休假以后，又以一个出色的哥萨克的身分重新回到前线。他心里一面和荒谬的战争难以妥协，一面又忠实地保持着哥萨克的光荣。他觉得战争初期笼罩在他心上的那种对人类的痛惜之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心肠变硬了。他冷淡而又轻蔑地拿别人的和自己的生命作儿戏，因此得到了四个乔治十字章和四个奖章。

十一月七日，第十二团向“三二”进攻，葛利高里腿部受了伤。

寂寞、痛苦的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过去，鞑靼村荒凉了，家家户户都呈现出一种破败的景象。只有村尽头的麦列霍夫家的院子，虽然仓房倾斜了，仓房顶上的铁公鸡也倒了，但是仍然很有次序，很整齐，而且人数也没有减少。娜塔莉亚去年秋天生了一对双胞胎：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当时，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听说儿媳妇生了双生子，就把两手一摊，高兴得哭起来。

一九一七年八月，临时政府的西南战线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命令部队去彼得格勒。第三骑兵团以强行军的速度，离开战壕，开往后方。一路上，哥萨克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但都很高兴，唱着歌，庆幸终于离开了战壕。兵车向普斯科夫方向开去。不久，大家都知道了，是开往彼得格勒，去镇压刚开始的骚动。一听说这个消息，哥萨克都静了下来。

“刚出火坑，又进地狱！”一个身材细高的哥萨克说出了大多数人的心里话。

在第一次停车的时候，哥萨克决定调转头来重返前线，而不去彼得格勒替科尔尼洛夫去打自己人。

哥萨克们急急忙忙地搭上跳板，开始把马匹从车里牵出来。

军官们毫无办法，过了一个钟头，连队的军官都走了。哥萨克依靠着一张从军官手中夺来的地图，判断着重返前线的方向，也开拔了。

十月底的一个早晨，率部来到彼得格勒的李斯特尼次基大尉接到团长的命令：率领连队开到冬宫去。

李斯特尼次基领着连队，经过了一片荒凉的涅瓦大街，进入了冬宫的院子。哥萨克都留在院子里，而军官们都聚集在远处的厢房里。连队的军事委员会委员拉古琴对哥萨克们说：

“这算怎么回事，乡亲们！咱们在这儿没有什么事可干。应该退出去，要不然咱们就要无辜受难。军官们连影子都不见啦，难道咱们是应该死的人吗？咱们回家去吧，至于临时政府，咱们要它有什么用处？”

第一连和第四连的哥萨克也走过来了。大家商量后，每连派一个代表，出宫门去和赤卫军联系。一个钟头后，他们领着三个水兵回来了。一个黑胡子的漂亮的青年水兵对哥萨克们说：

“哥萨克同志们！我们是革命的波罗的海舰队的代表，我们建议你们退出冬宫。你们无须保护违反你们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府。叫资产阶级的子孙——士官生去保护它吧。没有一个步兵战士愿意保护临时政府，而且你们的弟兄——第一团和第四团的哥萨克，已经和我们合作啦。谁愿意跟着我们走，请站到左边去！”

哥萨克们都疑疑惑惑地踌躇起来。拉古琴毅然决然地说：

“把枪扛起来，开步走！”

哥萨克差不多走到广场中间了，一个军官从后面也跟着走过来，他脸上露着微笑，哥萨克都用手招呼他走快些，但是来自后面的一声枪响，使他倒了下去。

一九一七年深秋，鞑靼村的哥萨克开始从前方回来了。他们给村子里带回来一个消息，说最近一个时期在第二后备团服务的葛利高里投降了布尔什维克，留在卡敏斯克了。

葛利高里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因为立战功被升为少尉，担任第二后备团的一个排的排长。十月革命以后，他又被指令担任了连长的职务。这期间他受到两个人的影响，一个是哥萨克军官伊兹瓦林，另一个是哥萨克上士波得捷尔科夫。

伊兹瓦林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他受的教育远远超过了哥萨克军官通常受的教育。二月革命以后使他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和那些信仰哥萨克独立自主论的人联合起来，宣传顿河军屯州完全自治的论调。葛利高里受到他的影响。

十一月里，葛利高里又认识了另一个哥萨克——费多尔·波得捷尔科夫上士。这位革命的哥萨克曾在顿河革命史上起过不小作用。葛利高里和他谈起了政权问题。波得捷尔科夫简单清楚地对葛利高里说：要建立人民的政权。

葛利高里默默无言地、痛苦地竭力想把混乱的思想弄清楚。

诺沃契尔卡斯克成了许多反革命将领和亡命徒的集中地。十一月二日，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来到这里，和卡列金将军谈判，他负责志愿军的组织工作。十一月下旬，邓尼金、鲁科姆斯基、马尔科大等将军也来到这里。十二月六日，科尔厄洛夫将军也在诺沃契尔卡斯克出现了。

一九一八年一月在卡敏斯克举行了前线哥萨克代表大会。葛利高里参加了这次大会。可是卡列金将军发出逮捕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全体人员的命令。但是这个命令被在卡敏斯克开大会的哥萨克截住，由波得捷尔科夫在大会上宣读了。

哥萨克们听完卡列金逮捕他们的命令以后，立刻喧哗起来，都主张积极反对诺沃契尔卡斯克的政权。

克里沃希雷科夫提议选出革命军事委员会，把顿河军屯州的政权转移到革命军事委员会手中。选举结果：波得捷尔科夫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克里沃希雷科夫为书记，委员有：伊万·拉古琴、郭罗瓦乔夫、米纳耶夫、库金诺夫等人。

代表大会承认了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列宁把这个重大事件通过无线电宣布出来：“在卡敏斯克镇的代表大会上，有四十六个顿河沿岸的哥萨克团宣布成立了自己的政府，要和卡列金进行斗争。”

卡列金一面以顿河军政府的名义同顿河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进行谈判，以争取时间，一面派出了柴尔涅曹夫上校指挥的由几百人组成的队伍，进攻

顿河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军队。

革命军事委员会方面，有第二十七哥萨克团的一名强有力的指挥员郭鲁博夫上校，组织抵抗柴尔涅曹夫，结果大获全胜，俘虏了四十名军官，其中包括柴尔涅曹夫本人。郭鲁博夫想把柴尔涅曹夫保出来，他叫葛利高里把这个意见带给波得捷尔科夫。波得捷尔科夫听到这个口信后气得喊叫道：“要由军事法庭审判他。”

俘虏们被赶过来的时候，柴尔涅曹夫骂波得捷尔科夫是哥萨克的叛徒。波得捷尔科夫抽出马刀砍死柴尔涅曹夫，并命令把俘虏全部就地砍死。

葛利高里无论如何不能宽恕不经审判就杀掉俘虏这件事。一月下旬，他由于腿上的伤住了一个星期医院，接着就回家疗养去了。他很想避开这个充满着仇恨的和难以理解的世界。此前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一片混乱，矛盾。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是很困难的。

一九一八年初，顿河流域的形势逐渐向着有利于苏维埃政权方面发展。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志愿军节节失利，撤退到库班方面去了。顿河军区司令官卡列金在一月底召开了顿河政府会议，他宣布说：只剩下一百四十七支枪保护顿河军屯州和诺沃契尔卡斯克，处境是没有希望的，老百姓不仅不支持他们，还仇恨他们。卡列金主张全体辞职，他也辞去司令官职务。会后，卡列金自杀。

可是到了一九一八年四月，顿河地区的革命形势逆转了。起因是红军个别队伍纪律不好，引起了顿河下游一些村镇居民的暴动。

顿河人民委员会苏维埃主席波得捷尔科夫决定带一支远征队去北方，想在那里动员起一些上过前线的士兵，组成三四个团，然后派他们去打德国人和镇压顿河下游的哥萨克暴动。彭楚克也参加了这支远征队。

彭楚克此前曾受罗斯托夫党委会的派遣，训练了一支十几个人的工人机枪队。机枪队中有一个美丽的犹太姑娘安娜，她热情、聪明、坚毅，有做宣传工作的能力。彭楚克和安娜共同参加过战斗，后来安娜成了彭楚克的爱人。不幸，安娜在一次战斗中牺牲，致使彭楚克陷入极端痛苦中。这次，波得捷尔科夫组织远征队，他很乐意参加，想以此摆脱怀念安娜的痛苦心情。

远征队进军没有赶在暴动的浪潮之前，沿途村镇的哥萨克的情绪和远征队中哥萨克的情绪有了变化。远征队到达卡拉希尼克夫村时已经是夜间了，波得捷尔科夫命令设岗哨，但是哥萨克都不愿意来集合，有三个人居然拒绝集合。他们不愿意和自己的人打仗，他们希望和平。当暴动的哥萨克的马队出现的时候，波得捷尔科夫看见只有一小部分队伍跟着他，他清醒地知道一旦交手必定要失败，于是他接受了和暴动的哥萨克代表进行谈判，并且交出了武器。

远征队交出武器后，暴动的哥萨克立即对远征队改变了态度，他们开始殴打俘虏。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新历五月十日）波得捷尔科夫部队的全体战士赴难牺牲，波得捷尔科夫和克里沃希雷科夫被送上了绞刑架。波得捷尔科夫临刑前对受骗的哥萨克群众高声说道：

“你们都是糊涂人……军官欺骗了你们，你们今天枪毙了我们，明天就轮到你们啦，苏维埃政权是一定要在全俄罗斯建立起来的……”

鞑靼村在哥萨克暴动期间，组成了由彼得罗·麦列霍夫为指挥官的反对赤卫军的队伍，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也参加了这个队伍。村里选米伦·珂尔叔诺夫为村长。米哈伊尔·珂晒沃依和丁钩儿从村中逃走了，在找红军的路

上，珂晒沃依被俘，依照判决，打十二鞭子，送上前线。丁钩儿在路上被枪击中牺牲，就埋葬在他死去的地方。不久，附近村子里的一个老头儿，在丁钩儿的坟头立了一个安放着神龛的橡木柱子，神龛里圣母的悲哀面容露出温柔的神情，神龛的小门框上用斯拉夫文写着两行字：

在混乱和堕落的时代，
弟兄们，不要审判自己的亲弟兄。

一九一八年四月，红军被迫撤出了顿河的不少地方。五月里，顿河军人联合会选出克拉斯诺夫将军为军区司令官。顿河的军队经过改编后，恢复了旧日正规军的建制。

鞑靼村的哥萨克连，在彼得罗·麦列霍夫的指挥下，参加了去往北方的进军。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指挥一个排。他们在行军的路上接到命令，连队要分成两半，由彼得罗和葛利高里各带领一半人马，去不同的两个团报到。分别时，彼得罗想和弟弟谈一谈，他说：

“葛利沙特加，现在是这样的时代，真是魔鬼一样的生活，也许咱们再也见不着面啦。老百姓分化得这样厉害，谁也猜不透谁的心思，我觉得你正在动摇……我怕你会跑到红军那边去……”

“恐怕不见得，我也不明白……”葛利高里勉强回答说。彼得罗叹了一口气。他们就这样分别了。

葛利高里几次和红军打仗，渐渐地憎恨起布尔什维克来了。布尔什维克成了他生活中的敌人，他们使他抛弃了土地！他眼看着这样的心情也正在控制着其余的哥萨克。他们都觉得发生这次战争，只能怪向州内进攻的布尔什维克，于是虐待俘虏和抢劫的事情不断发生。哥萨克们抢劫那些同情布尔什维克的人和红军家属……而葛利高里却相反，他非常憎恶抢劫和虐待俘虏。因为这个缘故，上级把他的连长职务撤销了，把他降为排长。葛利高里高高兴兴地把连队交了出去，知道再也不用对一连人的生命负什么责任了。

从十一月中旬开始，红军转入进攻。他们顽强地压迫着哥萨克的队伍往后退去。葛利高里冷漠地注视着战争的进程，他相信到冬天战线就再不会存在了，哥萨克都希望和平。然而结局比他预想的来得更突然。哥萨克都在放弃阵地，往后撤退，无论什么力量也阻止不住退却的洪流。于是葛利高里也怀着愉快的心情，在夜里自动离开了连队。第二天的黄昏，他已经把马牵进了自己家的院门。随后彼得罗也从队伍里回到了家。

一九一九年初，红军开进了鞑靼村。鞑靼村建立起苏维埃政权，选举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为村苏维埃主席，珂晒沃依为副主席。然而革命的局势并不稳定，一个不祥的消息沿着顿河的大小村庄流传开来，谣传肃反委员会和革命军事法庭，对那些在白军当过差的哥萨克进行了简单的和不公正的审判。这些流言有的人相信，有的人不相信。鞑靼村的哥萨克每天夜里都聚集在大街小巷打听消息。村子里的生活很安静，同时也很苦闷。村苏维埃政权周围只团结了几个人，他们和大多数哥萨克好像隔了一堵墙。

在二月的一个阴沉的日子，鞑靼村的生活发生了激烈的变化。这天从区里来了两个人，他们把军事法庭的介绍信拿给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看，并说：“把那些军官、神父、宪兵和财主——一切积极跟咱们作对的人的名单开出来。”

珂晒沃依开了一个要从鞑靼村逮捕的十个人的名单，其中包括葛利高

里·麦列霍夫和他的父亲。葛利高里躲出了村子，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正生伤寒病卧床不起，名单上的另一个哥萨克正在外出完成运输任务。除了这三个人外，村里逮捕了七个人。逮捕后把他们押送到维约申斯克镇的军事法庭。夜半时押送犯人去维约申斯克的人回来了。他把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叫醒说：

“他们把哥萨克枪毙啦！”

“你胡说，坏蛋！”

“我们把犯人押解到那儿，他们立刻审问起来，天还没有黑就押到松树林子里去啦……我亲眼看见的！”

这件新闻很快就传遍了全村：“枪毙哥萨克啦。”生活的太平平的浅滩一下子变成了凶险莫测的深潭，顿河上游骚动起来了。

葛利高里在外村躲藏了一些天。一天早晨，主人把他叫醒了，大声说道：

“你还睡哪？起来吧！顿河造反啦！……叶兰斯克和维约申斯克对岸的人都暴动了……”

葛利高里的额角上和脖子上的青筋都绷起来了，瞳仁里冒出了绿色的火焰。他掩饰不住自己的愉快，吃过早饭，牵出自己的马，像疯子一样，一溜烟从大门里飞跑出去。现在他觉得生活中根本没有一种可以使一切人都能在它的覆盖之下感到温暖的真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条真理，都有自己的道路。他要和那些想夺去他的生命和生存权利的人进行搏斗。哥萨克的道路和失去土地的庄稼佬的俄罗斯的道路，和工厂工人的道路是互相冲突的。要把顿河沿岸的土地从他们的脚下夺回来，把他们赶出州界以外去。可是一会儿工夫，他的心里又发生了矛盾：他觉得似乎这场斗争是财主和穷人的斗争，并不是哥萨克和俄罗斯的斗争。但他又赶走了这些念头。

葛利高里回到了鞑靼村。那天开村民大会，动员十六岁至七十岁的哥萨克都拿起枪来。村里哥萨克编成两个连。彼得罗·麦列霍夫任骑兵连长。

维约申斯克镇是军区的首镇，成了暴动的中心。哥萨克选举库金诺夫少尉担任暴动军联合司令，萨方诺夫担任参谋长。暴动军保留了苏维埃政权的形式和“同志”的称呼，口号很有煽动性：“拥护苏维埃政权，但是反对共产党，反对枪毙和抢劫。”

彼得罗指挥的鞑靼村连队，同红军在村外作战。红军包围了他们，彼得罗等十余名哥萨克投降后遭到砍杀，珂晒沃依亲手枪毙了彼得罗。

彼得罗死后，暴动军联合司令部任命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担任维约申斯克团团团长。普罗霍尔·泽珂夫当了葛利高里的传令兵。自此以后，不少村镇的暴动军不断加入葛利高里的队伍，葛利高里率领暴动军同红军数次作战。

暴动军逐渐扩大，已变成了有两万五千名骑兵和一万名步兵的队伍。他们被编成五个师和一个独立旅。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指挥第一师。

四月里，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威胁：暴动军和白军即将联合，红军必须在暴动军和白军联合之前，尽一切力量把暴动镇压下去。红军开始把优秀的兵团调往顿河战场，把暴动军封锁在顿河上游地区的范围以内。暴动军方面已经看明白：要长期保卫家乡是不可能的，因为红军迟早会消灭他们。葛利高里也看出暴动军所处的这种危险境地，他对他的部下说：

“现在咱们被红军包围了。咱们或者靠拢白军，或者靠拢红军，站在当中是不成的，他们会压死咱们。”

红军塞尔道布斯基团投降暴动军的消息传到葛利高里的团里。葛利高里

知道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和珂晒沃依在这个团，他想把他们救出来，虽说彼此流过血，然而并不是外人呀！

可是葛利高里没有来得及救出他的朋友，被俘的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在经过鞑靼村时，已经被葛利高里的嫂子妲丽亚开枪打死了。珂晒沃依在团队未投降前已经离开，施托克曼在劝说全团战士不要上当的时候，也壮烈牺牲。

一九一九年五月，红军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从顿涅茨方面开来，于是葛利高里才第一次真正感到打击的全部力量。他指挥的第一师节节撤退。最后，根据司令部的命令，全部撤退到了顿河左岸。

一九一九年六月，白军冲破红军的防线，和顿河暴动军会师了。暴动军司令部在维约申斯克镇军官俱乐部为庆祝会师举行宴会。会上谢珂列乔夫将军发表演说，教训暴动军的军官们说：

“我们不应该感谢你们的帮助，你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帮助，如果没有我们的话，红军早已把你们消灭啦，如果没有你们的话，我们也早已把他们打垮啦。你们应该立功赎罪，明白了吗？我们信任你们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你们的叛变我们是不能很快就忘掉的。要叫那些秋天里跑到红党那边儿去的人都好好记住。”

“我们给你们干也有一定限度！”有点醉意的葛利高里怀着愤怒的心情想着，“该死的坏蛋！他现在骂人，再过一个星期干脆就会动手掐你的脖子啦，没有想到会落到这种境地！”

葛利高里站起来，离开宴会厅，走到街上去。随后他和自己的传令兵普罗霍尔一起回到了鞑靼村。

黄昏的时候，葛利高里回到内室，和妻子并排坐在箱子上，想抽空儿说话儿，明天他又要上战场了。葛利高里打量着自己的妻子，她是一个内心美丽和纯洁的女子，她为他打扮得漂漂亮亮，她是米沙特加和波柳希伽的母亲。葛利高里心中涌起一股柔情，很想说几句温存的话，但一时找不到词句，就一声不响地跟娜塔莉亚坐到太阳西沉。

第二天早晨，葛利高里怀着沉重的心情，和普罗霍尔一块离开了鞑靼村，他们骑马走到山岗上的时候，葛利高里回头望了望自己的家门，看见娜塔莉亚一个人还站在那里，清晨的微风吹起她那像丧巾一样的头巾。

夜里他们回到师指挥部。师参谋长考佩洛夫向葛利高里报告说，刚才菲次哈拉乌洛夫将军传来口头命令，要求我们明天到他的师部去共同商量战斗任务。

黎明时分，葛利高里和参谋长考佩洛夫一道出发。

他们到达时，菲次哈拉乌洛夫将军正在吃早饭。他用低沉的声调对葛利高里和考佩洛夫说道：

“两位军官，暴动军的游击战争结束啦！你们的队伍不再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要把它编进顿河军去。

“您指挥一个师，我也指挥一个师，我是不能服从您的指挥的，我只服从暴动军总司令库金诺夫的指挥。”葛利高里说完，站起来，戴上帽子，走出了门。

一种奇怪的冷淡心情控制了葛利高里！他决心不再冒着炮火率领哥萨克进攻了，他不愿意保护那些仇视他的各种各样的菲次哈拉乌洛夫们，叫他们自己去打仗吧。

过了两天，暴动军改编了，为防止暴动军产生不满情绪，凡有战功的哥萨克都升了级，葛利高里也从少尉提升为中尉，同时也接到了把他从师长降为连长的命令。

有一天，娜塔莉亚从妯娌亚口中知道了葛利高里和婀克西妮亚又重新来往的消息，以后好几天她都像做着个恐怖的、没有法子醒来的恶梦。

她虽然还爱着葛利高里，心里扔不掉他，不过再也不能为他生孩子了，她已经怀孕两个多月，她一定要找村里的卡皮东诺夫娜大娘把这胎儿用钩子钩出去。

吃过午饭以后，婆母伊莉妮奇娜想再劝一劝娜塔莉亚，可是娜塔莉亚已经悄悄地走了。直到晚上，大家都睡下了，娜塔莉亚才回来。伊莉妮奇娜打开房门，在月光下看见娜塔莉亚惨白的、瘦削下去的脸、塌陷的眼窝和痛苦的弯着的眉毛，她拖拖拉拉、摇摇晃晃地走进门，在她踏过的地方，留下了黑色的血点子。

“你这是把自己弄成什么样啦？！”伊莉妮奇娜低声地抽搭着说。

“妈妈，我已经把胎儿坠掉了，不过血流得太多了，请您递给我一只手，我的脑袋晕……”

伊莉妮奇娜把娜塔莉亚扶在床上躺下，她看见儿媳的血湿的裙子像大雨淋过的一样，她恐怖地走到厨房去，叫醒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把事情的简单经过对他说了一遍。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怒冲冲地跳起来，去请医生。

娜塔莉亚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虚弱下去。半夜里，她睁开眼睛，问道：

“天快亮了吗？”

“还什么都看不见呢，”老太婆安慰她说，但是她自己心里想着：“大概是活不了啦！恐怕看不到孩子醒来就会昏迷过去……”

黎明的时候，娜塔莉亚恢复了知觉。太阳出来的时候，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从镇上请来了医生。医生检查完娜塔莉亚后，走出来说：

“血流得太多啦，一点办法也没有，午饭前就要完啦。应该通知葛利高里·潘苔莱耶维奇。”

早晨，娜塔莉亚情况又有好转，她要求洗洗脸，躺着对着杜妮亚希珈端的镜子梳了梳头发，很困难地笑着说：

“现在我可以好起来啦！我还以为我的生命就算完了呢……孩子们怎么还没醒？叫他们到这儿来！”

波柳希珈头一个走进屋来，打量着坐在长板凳上的大人们，很伤心地说：

“妈妈，你病了怎么不叫醒我，我可以陪着你，给你拿水……”

“真像爸爸，只是心不像他……”娜塔莉亚微微笑着说。

过了一个钟头，娜塔莉亚的情况愈来愈坏，她用手把孩子们招到跟前，抱住他们，对他们画过十字，亲了亲他们，请求母亲把他们带到家里去。

娜塔莉亚闭上眼睛，好像昏迷过去似的，说：

“这样一来，我再也不能见到他啦……”后来好像想起什么事情，猛然抬起身子：

“把米沙特加叫回来！”

忧郁的、生着麦列霍夫家的眼神的米沙特加胆怯地走到床前。

“把脑袋低到我脸前来，孩子！”娜塔莉亚央告他。

她对着米沙特加的耳朵悄悄地说了些话，后来推开他，试探地看了看他

的眼睛，竭力做出痛苦的笑容，问道：“你不会忘掉吗？”

“我不会忘……”米沙特加抓住母亲的手指，攥了一会儿，又放开了。不知为什么他踮着脚尖从母亲的床前走开……娜塔莉亚用眼睛一直把他送到门口。

中午时候，娜塔莉亚死了。

葛利高里在团部接到了关于娜塔莉亚死去的电报。他攥着电报，从台阶上下来，忽然间听不见自己的脚步声了，只感到一种尖利的疼痛，像刺刀一样刺进了他的心。他在台阶上摇晃了一下，左手抓住了栏杆，右手解开了军衬衣的领子，站了一会儿，深深地喘着气。

葛利高里从前线骑马在路上飞奔了两昼夜，在娜塔莉亚安葬后的第三天才到家。杜妮亚希珈抽抽搭搭地哭着跑到葛利高里跟前，伊莉妮奇娜拉着米沙特加和波柳希珈的手，走到台阶上来迎接儿子。葛利高里一把抱过孩子，用颤抖的声调说：

“我的亲爱的孩子！变成没有母亲的孩子了！”

他使出很大的力量抑制着哭泣，走进屋里，问候父亲。

“我们没能把她看护好……”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说，立刻就一瘸一拐地走到门洞里去了。

伊莉妮奇娜把娜塔莉亚去世的经过对葛利高里讲了半天。葛利高里走进内室去。他好像是头一次来到这间屋子里，仔细打量着四周，床上铺得整整齐齐，娜塔莉亚就是死在这张床上的，她在这张床上说完了最后一句话……葛利高里想象着娜塔莉亚怎样和两个孩子告别，怎样亲他们，为他们画十字……他又像接到通知死讯的电报时那样，心里感到一阵尖利的、刺心的疼痛，耳朵里响着嗡嗡的声音。屋里每一件东西都使他想到娜塔莉亚，他把屋子巡视一遍，急急忙忙走出去，差不多是跑到台阶上去的。他的心越来越疼痛，他的额角渗出了汗珠。

吃饭的时候，伊莉妮奇娜摆好桌子，放上一块餐巾，葛利高里心里想：“从前都是娜塔莉亚开饭……”他为掩饰自己的痛苦心情，急急忙忙地吃着饭。父亲拿来了一瓶老酒：

“咱们来祭奠祭奠去世的人吧，愿她在天上幸福！”

当他们喝第三杯的时候，米沙特加侧着身子，畏畏怯怯地走到桌子旁边来，趴到父亲的膝盖上，笨拙地用左手抱住他的脖子，使劲亲了亲他的嘴唇。

“你这是干什么，儿子？”葛利高里看着孩子那笼罩着眼泪的稚气的眼睛，激动地问道。

“妈妈躺在屋子里的时候……她还活着的时候，她把我叫了去，嘱咐我说：爸爸回来的时候，你替我亲亲他，告诉他说，叫他爱惜你们。她还说了些别的话，可是我忘了……”米沙特加低低地回答。

葛利高里放下杯子，把脸掉过去朝着窗子。屋里一片沉闷的寂静。他把儿子放到地上，自己急忙走到院子里去了。

为了摆脱伤痛的思念，葛利高里提前回到前线。

顿河军和暴动军会合混编以后，更加腐败，军官们日夜酗酒，哥萨克在许多村庄抢劫老百姓，奸淫妇女，焚毁粮食，屠杀牲畜，他们就好像外国的征服者一样。队伍里开小差的越来越多，哥萨克成群结队地逃跑。在前沿地上不服从命令、杀害军官的事情屡见不鲜。

十月里斯大林到了南方前线，制定了一个粉碎南方反革命的战略计划，

这个计划得到列宁和党中央的批准。这个计划一执行，南方前线立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志愿军在决战中失败了，布琼尼的骑兵队伍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十一月里，志愿军继续向南退去，暴露出顿河军的左翼，使顿河军也不得不撤退。红军取得最后胜利已成定局。

在顿河军撤退的日子里，鞑靼村召开了一个村民大会，会上决定哥萨克在十二月十二日全部撤退。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约好和另一个老大爷一块走。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上路后不久，染上了伤寒病，一月底就死在异乡。

葛利高里和普罗霍尔也撤退到了诺沃罗西斯克。这里，许多轮船把俄罗斯的富商、地主、将军的家属和有名的政治活动家运到土耳其去。志愿军的司令部也搬到英国军舰“印度皇帝号”上去了。几万难民挤满了街道，军队还在不断开来，码头上拥挤不堪，一片混乱。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葛利高里和另几个哥萨克在码头上远远地看见了从山上向下移动的红军散兵线。

一九二年初春，葛利高里和普罗霍夫在诺沃罗西斯克参加了布琼尼的第十四师。葛利高里当了连长。他自从参加红军以来变得很愉快，有一次在战斗中立了功，布琼尼站在队伍前面和他握手，并且向他和他的连队表示感谢。葛利高里决心要在红军队伍里一直干到把他过去的一切罪过都赎回来为止。

这年夏天，米哈伊尔·珂晒沃依从前线回到村子里，和杜妮亚希珈结了婚。

杜妮亚希珈结婚后不久，伊莉妮奇娜病倒了。过了些天伊莉妮奇娜死了。婀克西妮亚征得杜妮亚希珈的同意，把两个孩子领到她家里去了。

伊莉妮奇娜死后不多日子，珂晒沃依做了鞑靼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十分警惕地过日子，注意地研究村子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杜妮亚希珈收到了葛利高里的来信，知道哥哥在和弗兰格尔作战时又受了伤，等伤养好了他就返回家乡。

葛利高里坐着牛车复员回家，一路上想着心事：他打完仗啦，他打够啦，现在他要回家去，干起庄稼活来，跟婀克西妮亚和两个孩子一块儿过平静的日子。早晨他到了家。

当天晚上珂晒沃依和葛利高里进行了一次很严肃的谈话。珂晒沃依问道：

“为什么在这种时候叫你复员回家？不信任你啦，是不是？这儿也不会信任你，你要明白这一点！”

葛利高里的脸色刷地一下变得十分灰白。不久前他还非常简单而愚蠢地认为，他可以过上和平的庄稼人的生活，可是现在看来，一切都不那么简单。

无论怎么说，珂晒沃依也不能信任葛利高里，他命令葛利高里第二天就到维约申斯克肃反委员会去登记。

第二天黄昏，葛利高里从维约申斯克登记回来。肃反委员会让他过一星期再去作第二次登记。葛利高里明白了，他们一定会把他逮捕起来，或者干脆枪毙他。他决定在第二次登记前逃出村子。但是事情的发展急转直下，第四天晚上，杜妮亚希珈急急忙忙跑来，喘着气说：

“哥哥，你立刻逃走吧！镇上来了四个骑马的人，米哈伊尔对他们说，应该把你押起来……”

葛利高里的短短的和平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一九二二年深秋，由于实行余粮征集制，顿河一些村庄又发生了骚动，出现了杀害征粮队员、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匪帮。转年春天，葛利高里也落入了佛明匪帮。

佛明匪帮每到一个村镇，就鼓动哥萨克参加他们的匪帮，废除余粮征集制。但是哥萨克都表现得很谨慎，拒绝支持暴动。妇女们一致反对把她们的当家人拉去打仗。

一九二一年的春天来了，春耕的时候又到了，土地在召唤人们返回家园，佛明匪帮的人数也一天比一天减少，每一次宿营后，第二天总要少几个人。

葛利高里非常痛苦，他不想再把命运和匪帮连在一起，他决定离开匪帮。他心里想着：“谁都不需要我们，我们妨碍一切人的和平生活、和平劳动。应该结束这种行为，够啦。”

夜里他骑着一匹马，带着一匹马，离开了行进的队伍，等到队伍的马蹄声渐渐远了的时候，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顺小路匆匆跑去。后半夜到了鞑靼村的对岸，他从下游较浅的地方过了河，把马放在土沟里面，徒步进了村。他跳过篱笆，来到婀克西妮亚家。

葛利高里暂把孩子托付给妹妹，将来再来接，就匆匆忙忙和婀克西妮亚上路了，他们要去南方。夏夜很短，东方的天边已经露出了红色的亮光。他们骑上了葛利高里留在土沟里的马，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一片林子里。他们就在这片林子里的空地上休息做饭。

吃过早饭，把军大衣铺在地上，葛利高里躺了下来。他已经一连几夜没有睡觉，非常想睡。婀克西妮亚坐在他旁边，讲孩子，讲这些日子她受了多少苦：

“孩子们想你，他们问爸爸在哪儿？有一回米沙特加从街上跑回来，哭得非常伤心，他说，孩子们都不跟他玩啦，他们说，你爸爸是土匪……我对他说，你爸爸不是土匪，他是一个不幸的人。普罗霍尔一直很想念你，他说，把一个人给糟蹋掉啦……”

深夜，月亮升起的时候，他们出发了，路上遇见了征粮队的哨兵。葛利高里使劲儿用皮鞭把婀克西妮亚的马抽了一鞭子，那马一冲，离开原地，飞跑起来，葛利高里紧跟在后面，低声喊道：

“趴下来！趴低一点儿！”

婀克西妮亚忽然往后一仰，葛利高里扶住了她：

“打中什么地方啦！？……快说呀……”

葛利高里一面跑着，一面把她搂到自己怀里，气喘吁吁地小声说：

“为了上帝！你说一句话，你这是怎么啦！？”

葛利高里从大路上拐进一个土沟，下了马，把婀克西妮亚抱下来，血不断地从她的锁骨和嘴里往外流。葛利高里顿时明白了，他一生中能发生的、最可怕的事情，如今已经发生了。黎明前，婀克西妮亚死在葛利高里的怀里。

他在清晨的阳光照耀下，埋葬了自己的婀克西妮亚。他坚决相信，他们的离别是不会长久的。他好像从一场恶梦中醒了过来。

婀克西妮亚死后，葛利高里在逃兵的土窑里住了一阵子。他常梦见孩子、婀克西妮亚、母亲和其他已经不在人世的亲人。他反复地想，要是能回家看看孩子，就死而无怨啦。

一九二二年春天，葛利高里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他决定动身回家去。第

二天早晨，他到了鞑靼村对面的顿河岸边，激动地看着自己家的院子，愉快的心情使他的脸色变得白白的。他站在陡峭的岸边，把步枪、手枪和子弹扔进刚刚在融化的、靠近岸边的绿色河水当中，然后仔细在大衣上擦了擦手。他踏着三月的、蓝色的河冰，穿过顿河，大步向自己家走去。

葛利高里在许多失眠的夜里所幻想的那一点点希望总算实现了。他站在自己家的大门口，手里抱着儿子……这就是在他生活中残留的全部东西，这就是使他暂时还能和大地，和整个这个巨大的、在冷冷的太阳下面闪闪发光的世界相联系的东西。

《静静的顿河》描写了哥萨克在两次战争和两次革命中的动荡生活。作者把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二年间的历史事件作为长篇小说的情节基础，把中农哥萨克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命运及其一家在急剧转折时期的变迁放在长篇小说的中心。围绕着葛利高里和麦列霍夫一家的命运，几个处于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地位的家庭的兴衰沉浮、众多人物的生活遭遇，都在错综复杂的联系和纠葛中展现出来。葛利高里及其一家的命运、其他几个家庭的命运、哥萨克的命运和巨大变革时代的历史事件，复杂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通过人物的命运、哥萨克的命运展示了历史的进程，而历史发展的趋势又决定着人物的命运、哥萨克的命运。

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葛利高里是顿河劳动哥萨克的最有代表性的分子，然而他不是顿河劳动哥萨克的最觉悟的分子。哥萨克所具有的一切优点和弱点，在他身上都体现得最充分、最深刻。他在历史事件中处于冲突的焦点上：他同各种社会力量及其代表人物，无论是白军军官，反动将军，布尔什维克，革命哥萨克，随着历史的发展都发生了冲突。他在国内战争中从一个营垒投入另一个营垒，反反复复，企图寻找正确道路而终不可得。他的悲剧是一种时代现象。他的生活道路典型地表现了哥萨克在革命转变中的悲剧性的、曲折的历史道路。正确分析葛利高里这个复杂的人物性格和他的悲剧命运，对于正确了解《静静的顿河》的思想、艺术构思有着根本性的意义。

肖洛霍夫在书中描写了造成葛利高里和顿河哥萨克在国内战争中的悲剧性道路的错综复杂的原因。历史形成的哥萨克社会的客观复杂性、布尔什维克党在对待哥萨克问题上的过火政策、以及顿河流域在斗争年代所呈现的独特的、严酷复杂的情势等等，使葛利高里这样一个具有独特而又典型的性格的人物，不能不在选择正确道路的过程中经历无数的波折和反复。他虽然是一个当机立断、勇于行动的人，却不能不经受多次的怀疑和犹豫；他虽然对于是非很敏锐，但却一再步入迷津，不断地碰壁，碰得头破血流；他探索正确的道路、寻求真理，但却为一些扭曲的事物表象蒙蔽了视听；他应该在革命阵营中找到自己的归宿，但是他总觉得这里有许多陌生的、冷漠的、与他感情格格不入的东西；他经过了非同一般的积极的寻求、艰难的摸索、痛苦的磨练，经过了尖锐的矛盾，经过了血的洗礼，最终才领悟出历史的必然。尽管作家在描述葛利高里的悲剧命运时，涉及到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中对对待哥萨克的某些过火的政策，但是，作家的高超的艺术手法却强有力地肯定了苏维埃现实，歌颂了伟大的革命和为实现革命而斗争的英雄的人民。葛利高里在经过了曲折和苦难之后，最后还是回到家里，回到苏维埃政权管辖下的生活中来。

这部长篇小说气势磅礴，场面宏伟，着笔细腻，雄浑的战争描写和日常生活场景相互转换，景物描写和人物心理活动彼此衬托，充分体现出肖洛霍

夫所特有的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

《被开垦的处女地》

反映苏联一九三一年农业全盘集体化这一巨大社会变革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于一九三一年动笔，一九三二年出版。这部作品尽量地摄取了正在发展着的生活现实的本来面貌，真实地反映了急速变化着的、不断飞驰向前的伟大历史运动。第二部完成于一九六一年，描写的时代虽然仍旧是一九三一年的农业集体化时期，但是却更多地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精神世界，体现了五十年代的时代特点。

一九三一年一月里的一个夜晚，有个骑马的人沿着草原的小路进了格列米雅其村。他在一株白杨树后面的宽敞的瓦房前下了马，用鞭子柄轻轻地敲了敲窗：

“雅可夫·鲁基奇，出来一下。”

主人走下台阶，仔细打量着来客，突然认出来了，原来是他的老连长，白卫军军官波罗夫采夫，他慌忙地向四下里张望了一下，低声说道：

“上尉先生，您这是从哪儿来的呀？……多少年没见了……”

“好多年了……你家里没有客人吧？”

他们走进厨房，来客脱下风帽，露出又高又秃的前额，他用淡蓝色的小眼睛向周围扫了一眼，向女主人鞠了一躬。

一九二一年他们二人随着白军败退到诺沃罗西斯克，从那里分手以后，雅可夫·鲁基奇·奥斯特洛夫诺夫就回到了家乡。十年以来，他靠着自己的狡猾和聪明才干，已经种上了二十八公顷地，变成了一个富农。可是现在，在即将开始农业集体化的时候，他非常害怕会把他当做富农来斗争。他的老连长亚历山大·安尼辛莫维奇·波罗夫采夫上尉，在一九二一年白军覆灭之后，便加入了红军，后来被清洗委员会查出了他当白军军官的历史，把他押送革命法庭，半路上他逃跑了，躲藏下来，教了一段书。现在他趁一些哥萨克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的机会，鼓动他们加入反革命组织“故乡顿河解放同盟”，同布尔什维克斗争到底。他劝奥斯特洛夫诺夫也加入这个组织。奥斯特洛夫诺夫回答道：

“您让我想一想，叫我干这种事真有点害怕。要不是他们压制有钱人，凭我的努力，我现在早该坐上自备的汽车了！”

奥斯特洛夫诺夫经过一夜的犹豫，天一亮就决定加入同盟。

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于一九三一年初在全国展开，党派出了两万五千名优秀工人支援农村，普梯洛夫厂钳工谢苗·达维多夫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他在国内战争年代曾经当过波罗的海舰艇上的红水兵，现在被派到格列米雅其村来。他坐着爬犁来到村苏维埃的院子里。大家很喜欢这个外来人，他们感到他和区里来的干部不一样，他对人和气，还亲自卸马，这真很奇怪。达维多夫向办公室走的时候，大家都跟在他后面。

“你们上苏维埃去干什么？”

“我们很想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

“是为集体农庄的事。”

舒卡尔老爹不高兴地吹了卢口哨，带头转身走了。

达维多夫走进办公室，看见一个高个子、穿草绿衬衣的哥萨克，他的衣

服上挂着一枚红旗勋章。达维多夫猜想，这就是村的党支部书记玛加尔·纳古尔诺夫了。他们互相作了介绍。接着村苏维埃主席安德烈·拉兹苗特诺夫从隔壁房间走进来，他庄重地向达维多夫伸出了手，带着天真的神气打量达维多夫，不停地眨动那双像夏日的晴空一样清澈的眼睛。他的额上有一条青色的伤疤，这是国内战争时期白军留在他头上的。

他们在桌旁坐下，纳古尔诺夫和拉兹苗特诺夫向达维多夫介绍了村里的情况。达维多夫把党提出的剥夺富农财产、消灭富农阶级、争取在两个月内实现全盘集体化的任务告诉他们，并且建议明天就召开贫农和积极分子大会。

纳古尔诺夫听后兴奋地对达维多夫说：

“亲爱的工人同志，我一听说要集体化，把庄稼汉的私有财产统统并到集体农庄里，心里真痛快。我从小就恨私有财产。有学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志说得对，一切罪恶都是由于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如果不没收，就是在苏维埃政权底下，人们也会为了这脏东西像槽子旁边的猪那样你争我夺，打个没完。国内战争期间，我在前线受到聪明人的开导，回来就成了布尔什维克。我现在又像处在国内战争时期了，像在前线打仗。就是粉身碎骨，我也要把大家拉进集体农庄。世界革命越来越近了。”

第二天召开了贫农和积极分子大会，达维多夫在会上深入浅出地讲解了集体化政策和它的优越性，大家举手一致同意加入集体农庄。接着，由达维多夫、纳古尔诺夫和拉兹苗特诺夫分两路，带人剥夺了富农财产。晚上又召开全村大会，动员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会场气氛热烈。一些中农表示要观望一下，然后再加入。这时，一个戴布琼尼帽的中农，他名叫康德拉脱·梅谭尼可夫，从后面挤到了讲台旁边，从身上掏出一本肮脏的笔记本，照着本子详细地念了他一年拚命干活后的所得，认为不能再单干下去了，必须加入集体农庄。他劝大家说：

“联共党推你们去过新生活，可是你们像瞎眼的小牛：人家把它推到母牛底下去吃奶，它还要踢，还要摇脑袋。可是小牛不吃奶，就活不成！我今天就写申请书，加入集体农庄，也劝别人这样做。”

拉兹苗特诺夫提议，请愿意参加集体农庄的人举手。二百一十七户中只有六十七户举了手，但是没有人反对，多数想再观望一下。大家赞成把集体农庄命名为斯大林集体农庄。

梅谭尼可夫从会场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周围一片寂静，他走进牛栏去看牛，抓一把干草放在槽里，可是一想到明天就要把牛牵到公共牛栏去，又抱了一大捆干草，大声说：

“分别的时候到了……过来点儿，秃鬼！四年来咱们俩一起干活，哥萨克靠牛，牛靠哥萨克……可是咱们干不出名堂来……”

梅谭尼可夫看着公牛，想到这牛在家里是和孩子一块长大的，心里一阵难过，流下了眼泪。剩下的半夜他没有睡，不断地抽烟，直到天亮，他才打起瞌睡来。他在梦里也很痛苦。他接受集体农庄可不容易啊。他是带着眼泪，带着血，好不容易才把那条跟私有财产、跟耕牛、跟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连接着的脐带撕断的。

早晨梅谭尼可夫把牲口牵到农庄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了一大群牛、马和羊，像赶集一样。贫农留比什金也牵着自己的牲口来了，他脸上还挂着抓伤的痕迹。梅谭尼可夫问他，是谁抓伤了他的脸。留比什金很不高兴地回答说：

“我那鬼老婆扑过来抢牛，把我抓伤了。她像辆坦克似的冲过来，我们在牛栏旁边展开一场血战。我说：你竟敢打红色游击队员吗？连将军都被我们揍过不知多少次了！……”

自从牲口牵入公共牛栏、马房以后，周围总聚集着一帮哥萨克。有一次梅谭尼可夫在马房值班，达维多夫和拉兹苗特诺夫来看马，达维多夫问梅谭尼可夫：

“为什么总有一批人聚在马房门口？”

“您问他们去！人家动手给马上料，他们就跑来了。这些都是马主人，他们怎么也抛不掉私有观念。总问你：你给我的枣红马上过料吗？你给我的黄马铺过草吗？我那匹母马还在这里吗？……个个都想帮忙给上料，个个都想给自己的马多吃点……应该立个规矩，不准闲人在这儿！”

“听见吗？”安德烈向达维多夫挤挤眼，感慨地摇摇头。

“把他们赶走！”达维多夫严厉命令说。“除值班的谁也不许来！”

牲口入了公栏，土地并在一起，集体农庄的家业很大，需要一个精明强干的经理。达维多夫决定让会科学种田的先进农民奥斯特洛夫诺夫来担任，安德烈也同意，只有纳古尔诺夫认为奥斯特洛夫诺夫是富农，是个异己分子。

奥斯特洛夫诺夫是个精明的人，他一辈子追求财富，但是苏维埃政权挡住了他的路，使他不能追求那像花花绿绿的钞票一样闪闪发亮、飒飒作响的生活，为此他和苏维埃政权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他要跟随波罗夫采夫一起去夺回那旧日的生活。他根据波罗夫采夫的命令，从内部去破坏集体农庄。他在会上积极参加集体农庄，会下却挨家挨户动员中农不要参加集体农庄，他劝告说：

“你们真傻，为什么参加集体农庄？我跟你们的情况不同，他们可能清算我，可是你们为什么往那儿钻呢？他们将会把你们压得看不见天日……”接着就宣传从波罗夫采夫那里听来的一套话，什么实行集体化后，还要共产共妻，现在别的地方哥萨克要起来暴动，国外还要支援。这样，他招募了三十名哥萨克加入了他们的“同盟”。他常和这些人暗中开会。有一次，一个过去曾经在白军讨伐队当过差的贫农诃普罗夫不同意发动暴动、杀共产党，并且向奥斯特洛夫诺夫指出，他家藏的那个军官是外路人，来历不明。当天夜里，奥斯特洛夫诺夫领着波罗夫采夫和地主儿子季莫非杀死了诃普罗夫夫妇。

奥斯特洛夫诺夫接二连三地暗中破坏集体农庄。他让把牲口能吃的嫩草铺在地上，遭到梅谭尼可夫的拒绝。他又在寒冷的二月，给牛铺上沙土过夜，致使好多头牛冻得不能从地上爬起来，有几头牛断了尾巴，其余的也都冻病了。这次破坏行为引起了达维多夫的警惕，他怀疑奥斯特洛夫诺夫是个破坏分子，考虑撤销他的经理职务，但是继而又想到，或许他并不是故意的，而是出于想搞革新的动机，因为他此前曾经非常爱护牲口，修盖温暖的牲口棚子，亲手护理生病的马匹，还为农庄节省饲料……这样一来，达维多夫又消除了怀疑，再一次让奥斯特洛夫诺夫轻轻地滑过去了。

奥斯特洛夫诺夫在家中和波罗夫采夫一起，又筹划了一个新的阴谋：他带头杀牲口，他要让布尔什维克的农庄没有牛耕地，让他们垮台。由于他的带头，格列米雅其村的居民开始杀起牲口来，两夜的工夫，村中有角牲口减少了一半。大家都动手杀，谣言到处流传：“杀呀，如今不是我们的了！”“杀呀，反正要被肉类收购站拿走！”“杀呀，进了集体农庄就没有肉吃了！”

村里不论男女老少，个个吃得闹起肚子来。

纳古尔诺夫急得团团转，他一家一家去劝说，给他们讲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可是他刚迈出门坎，就又听到杀牲口的声音。他气得对达维多夫说：

“他们杀牲口，情愿胀破肚子，也不把牲口交给集体农庄。我建议把恶意杀牲口的人枪毙！”

“什么？难道为了宰牛可以枪毙人吗？糊涂虫！应该去解释我们的政策，应该开会制止杀牲口！”

开了大会，刹住了这股风。党支部又作出决定：凡是属于斯大林集体农庄庄员的牲口，不论大小，全部收归公有，连家禽也同样处理。在家禽归公问题上费了一点周折，反对最激烈的是娘儿们。纳古尔诺夫终于用热情洋溢的话，说服了她们：

“我亲爱的娘儿们！让鸡也过过集体农庄的生活吧。到春天，我们要买一个孵卵器，孵化小鸡。你们养鸡有什么好处，到春天要给你们添多少麻烦，一会儿母鸡跑到菜地里啄青苗，一会儿把蛋下在仓底下，一会儿脖子被黄鼠狼咬断……你们天天要钻到鸡笼里去摸，看哪一只只有蛋，多么麻烦。鸡进了集体农庄，生活会很好，我们找个老头子，比如说安金姆老爹吧，让他一天到晚去摸蛋，管鸡，这活儿又轻松又愉快，老头子干正合适。我的娘儿们，请快表示同意吧。”

娘儿们笑起来，谈了一会儿，叹着气表示同意了。

纳古尔诺夫和达维多夫顺路去看舒卡尔老爹。纳古尔诺夫很有把握地说：

“他是个积极分子，他说过应该保护牲口，他不会宰的。”

可是迈进门坎，就看见一个土医婆给舒卡尔老爹拔罐子，治泻肚。

“你把小牛宰了？”

“小牛没有了……我是着魔了，听了老太婆的话……你们开恩吧，别把我从集体农庄开除。”

纳古尔诺夫摆摆手，和达维多夫一块走了出来。

舒卡尔老爹是个意趣横生、喜爱吹嘘的老人，第二天他蹒跚地在村子里走来走去，逢人就讲，达维多夫和纳古尔诺夫到他家作过客了，向他请教农庄的事。他卷着烟，感叹地对听众说：

“我稍微有点病，他们就上门来找我。没有我，他们什么事也搞不成。他们给我介绍各种各样的药方。他们说：老大爷，好好养病，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完了。我总给他们出主意……”他边说，边观望着他的话给别人留下了什么印象。

集体农庄的日子非常繁忙，为春耕作准备，开大会决定把春播的种子从各户收集起来，统一由农庄保存。区里派来宣传队，协助格列米雅其村收集种子。纳古尔诺夫白天忙着各种事情，晚上继续工作，把没有交种子的农户一个个叫到村苏维埃来，进行说服教育。单干户葛利高里·班尼克也为交种子的事被叫到苏维埃来了。纳古尔诺夫声音低沉地对他说：

“坐吧，葛利高里·马特维奇。”

“谢谢你的邀请。”

“你有种子吗？”

“当然有，都筛过，像金子一样。”

“好样的！明天送到公仓来吧！”纳古尔诺夫松了一口气。

“粮食我不运来，放在自己手里稳当些。”班尼克放肆地笑了笑。

“怎么你不信任苏维埃政权吗？！”

“不信任！我听你们撒谎听够啦！”

“闭嘴，恶棍！”

“你别向我吆喝！滚你的！我现在回去把粮食喂猪！与其给你们这些寄生虫，还不如喂猪！”

纳古尔诺夫两步跳到门边，截住了班尼克的退路，拔出手枪，用枪柄猛击班尼克的太阳穴，血从头上流了下来，班尼克摇晃了一下，扶住墙。纳古尔诺夫抓住他的膀子，把他推到桌旁，把一支铅笔塞在他手里：

“写！反革命，我现在就审判你，你要是不写，我就枪毙你。写：‘我过去是个积极的白卫军、马蒙托夫分子，曾经手拿武器攻击红军。现在我收回极度侮辱联共（布）……’‘联共’两个字要大写。‘……和苏维埃政权的话，并且向它们请罪。我虽然是个隐藏的反革命，但保证以后决不在口头上、书面上、行动上损害全体劳动人民所热爱的、并用劳动人民大量鲜血换来的苏维埃政权，我将耐心地等待世界革命……并要把麦种于明天送到公仓。特立此据为凭。’签上名！”

“纳古尔诺夫，这件事你要负责任！”

“我们做什么事都自己负责任，可是明天你如果不把麦种送来，我就枪毙你！”

这件事达维多夫知道后，狠狠地批评纳古尔诺夫说：

“你就用这种方法来宣传收集种子吗？”

“谁叫他侮辱苏维埃政权。我又没有发誓忍受敌人的侮辱、忍受白匪的侮辱！”

“你不应该打他。从政治角度考虑会怎么样呢？对别人会起什么坏影响呢？”

为了纳古尔诺夫的事，晚上开了支部会，大家因为他用手枪强迫农民交种子，给予他一次严重警告处分。

夜里，波罗夫采夫带着奥斯特洛夫诺夫去华依斯科伏村，向那里的盟员说明，决定从他们那里发起暴动，因为那里离镇近一些。他们到达村里，在一个熟识的哥萨克门前下了马。那里有二十多个哥萨克等待着他们，多半是老头子。波罗夫采夫进门后，一一同他们握手问好，然后他压低了声音说：

“哥萨克先生们，你们当奴隶的日子快结束了，后天夜里我们就动手，我们的战斗准备已经一切就绪……”

等他话音一落，一个年纪很老的哥萨克站起来说：

“上尉先生，您没有听说三月二号《真理报》上的斯大林同志的文章吗？我们已经念过了，这张报纸让我们同你们分手了……”

“谁委托你代表大家说话？你为什么胡说八道？”波罗夫采夫气得发抖地问。

这时候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矮个子哥萨克站起来，带着挑战的口气回答道：

“旧时代的军官同志，您别对我们老年人嚷嚷了，我们在苏维埃政权底下再也看不惯这种态度了。这位老头儿说得对，我们读了斯大林的文章《胜利冲昏头脑》，决定不暴动了。我们和你们不走一条路。现在的情况和以前不同了，地方上那些强迫老百姓加入集体农庄、又自作主张封闭教堂的共产

党员，斯大林把他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还要撤他们的职……”

“哥萨克先生们，随你们的便……我们将来要像枪毙叛徒那样枪毙你们！……滚开！让路！……”波罗夫采夫拔出手枪，向门口急急退去。他和奥斯特洛夫诺夫在黑暗中骑上马，冲出院子。

斯大林的文章震动了当地的区委。在这之前，区党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先是姑息富农，后来又单纯追求集体化的百分比。现在他们不但不检讨自己在执行集体化政策上的偏差，反而把纳古尔诺夫叫来，把区里强令格列米雅其村执行过左政策的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到纳古尔诺夫头上。纳古尔诺夫承认自己有错误，但他说：

“可是我做这一切……希望对革命有利，也许我错了，但是请你们谅解，我对党没有恶意。我打班尼克，也是因为他嘲笑党，要拿种子喂猪……”

主持会议的区委书记想赶快结束这件事，他匆匆地说：

“我认为纳古尔诺夫在集体农庄运动上恶意破坏党的路线，应该惩罚他，以警戒别人。我们来表决吧。谁赞成把纳古尔诺夫开除出党？好，四票同意，巴拉宾同志，你反对吗？”

民警局局长巴拉宾向桌上拍了一下，气得青筋都鼓了起来：

“我不但坚决反对，而且坚决抗议！这样的决定根本不正确。这是官僚主义的对人态度！我要写信给州委……”

纳古尔诺夫脸色白得像死人。他的身体颤抖着，说话的声音简直辨认不出来了：

“党证我不交。……没有党叫我上哪儿去？那还不如把我从生活里开除吧……”纳古尔诺夫的嘴唇哆嗦着，眼泪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

纳古尔诺夫像失去知觉一样走出门口，从篱笆上解下马，靴尖踏到镫上，然后就像鸟一般飞上鞍子。

纳古尔诺夫从镇上骑马跑了二十公里光景，来到大路边上的一个古坟旁，他勒住马，跳了下来。他茫然地望着这荒凉的草原，不见一个人影。他在坟脚下躺了下来，淡漠地想着：

“我回到家里，跟安德烈和达维多夫告别一下，穿上那件从波兰前线回来时穿的军大衣，就用手枪自杀。我对生活再没有什么留恋了！革命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失。干革命的人还愁少吗？……达维多夫大概会在我的墓上说：纳古尔诺夫虽然被党开除了，他可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的自杀行为，我们并不赞成，事实如此，可是他跟世界反革命斗争的事业，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接着纳古尔诺夫又想象，班尼克准会露出得意的样子，笑嘻嘻地在人群里走来走去，捋捋胡子说：“死掉了一个，谢天谢地！恶狗不得好死！”

“哼，别做梦了，毒蛇！我不自杀了！我要和你们这些混蛋干到底！”纳古尔诺夫好像被什么螫了一下似地跳了起来。他一想到班尼克，就改变了主意。“我死还轮不到你们开心。至于区委书记的话，也不是最后审判，我要去州委一趟，他们会让我恢复党籍的！……”

纳古尔诺夫急急地寻找自己的马，然而马却飞一样地向村里跑去。纳古尔诺夫只好顺着耕地大步走去。

当纳古尔诺夫在古坟脚下前思后想的时候，村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农庄庄员们都到地里干活去了。留在村子里的娘儿们和一些哥萨克，听信了奥斯特洛夫诺夫和班尼克说要把格列米雅其村的种子运到国外去的谣言。他们准备打开公仓，抢走保存的种子。娘儿们把拉兹苗特诺夫锁进地窖，开始寻找

达维多夫。达维多夫知道情况后，为提防事情闹大，就派人骑马去生产队叫人，同时为了保险起见，把粮仓钥匙也让人带走了。然后达维多夫不慌不忙地向粮仓走去。娘儿们看见他走过来，才安静了一点，接着响起一片喊声，好像冰雹打在铁皮屋顶上：

“ 钥匙拿来！ ”

“ 解散集体农庄！ ”

“ 给我们种子！ ”

“ 滚你的蛋！谁请你来的？！ ”

达维多夫沉着地对人群说：

“ 公民们，你们怎么不服从苏维埃政权的命令？…… ”

娘儿们拥上来，向他要钥匙，并且向他脸上、背上乱打，达维多夫脸色发白，拚命想挣出手来，可是被娘儿们紧紧抓住。达维多夫一会儿说钥匙在寓所，一会儿说在办公室，拖延着时间，等待着生产队的人到来。

一路上，娘儿们狠狠地打着达维多夫，他的衬衫沾满了血，裤子也撕破了，他喘着气说：

“ 我们干事都是为了你们，你们还要打死我……混蛋！钥匙我不给，懂吗？ ”

一个姑娘从粮仓那边跑过来，叫道：“ 哥萨克已经砸开锁，在分粮食了。” 娘儿们放开达维多夫，向粮仓跑去。

这时，纳古尔诺夫走进村来，他正赶上分粮的高潮，地上和粮仓台阶上撒了厚厚一层麦种。纳古尔诺夫立刻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他推开众人，冲到粮仓门口，砰地一声关上仓门，脊背紧靠在门上：

“ 谁答应你们分粮食的？ ”

“ 我们自己拿！ ”

“ 散开！不许拿粮食！谁敢走近粮仓，我就宣布谁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

纳古尔诺夫的出现，大家都感到意外，因为一大早就有谣言说，他由于打了班尼克，被区委抓去审判、坐牢去了。几个哥萨克犹豫不决地往粮仓跟前走去。纳古尔诺夫从裤袋里掏出手枪，扳起枪机。人群站住了。大家都明白，要是纳古尔诺夫扳起枪机，必要的时候他会开枪的。一条铁轴飞过来，“ 嘭 ” 地一声打在纳古尔诺夫头上方的大门上。纳古尔诺夫像最优秀的战士一样，他躲开向他扔来的东西，朝天开了一枪，立即跑下台阶。人群坚持不住了，你推我挤地转身逃跑。班尼克不知从哪儿又钻出来，拦住逃跑的人：

“ 别跑！他只剩六颗子弹了！ ”

忽然人群散开了，有人叫喊道：

“ 民警来了…… ”

远处有三十来个骑马的人，向村里飞跑。领头的是留比什金。下午，来了一个民警，逮捕了几个人。

到傍晚，除去糟蹋了几普特粮食之外，小麦全部收回来了。晚上开了村民大会。到会的人空前的多，达维多夫对大家说道：

“ 公民们，你们抢种子的行为表示了什么？表示你们向富农那边倒过去了，这是可耻的事情。你们有些人太没有觉悟，竟鼓动妇女打我…… 有一位女公民要我跪下来讨饶，把粮仓钥匙交给她！可是，我们布尔什维克可不是那样的人。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给人下过跪，我们倒常常叫无产阶级的

敌人下跪……”

“我们要叫全世界的敌人都跪下来！”纳古尔诺夫插言道。

“我们布尔什维克无情地惩罚敌人，但是对于你们，虽然你们听了富农的鬼话，抢了粮食，我们也不采取行政措施，你们只是暂时迷了路，我们让你们睁开眼睛……”

后排有人感动地、用亲切的低音说道：

“达维多夫好朋友，你这个人是不记仇，我们都感到良心上过不去……”

这次事件以后，农庄把保存在公仓里的单干户的种子都发还他们本人，鸡鸭早已发还给各户了。庄员的小牛、奶牛也由各家领回去了。四月份农庄的三个生产队都投入了春耕。第二生产队的成绩不佳，达维多夫决定去那里蹲点。拉兹苗特诺夫很不以为然，他对达维多夫说：

“你是农庄主席，你的工作是领导，可不是跟着犁走……”

“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然后才是农庄主席！那边耕地进行得不好，难道我可以呆在这里吗？”

“一个指挥员不应该跟着队伍走，他应该指挥作战！”

“难道我没有见过好的指挥员吗？遇到困难能够以身作则，就是好指挥员。”

达维多夫来到第二生产队，在他的带动下，第二生产队展开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整个农庄春耕春种进行得很顺利。五月里，麦苗欣欣向荣，又下了一场及时雨，麦苗上的水珠，在阳光下像一串串的玻璃珠子闪闪发亮。农庄将会有个好年景。

格列米雅其村斯大林农庄日益巩固、兴旺，区委领导班子改组了，撤换了旧区委书记，新书记聂斯杰连科上任，恢复了纳古尔诺夫的党籍。但是村里仍然不平静，敌人躲藏在奥斯特洛夫诺夫家里等待时机掀起暴动。每天夜里都有人来，给波罗夫采夫上尉和后来也躲进奥斯特洛夫诺夫家的廖切夫斯基少尉送信件或武器。奥斯特洛夫诺夫常常为准备暴动的事担忧。有一天他得知自己的母亲可能会暴露他家藏有白军军官，就活活把母亲饿死了。

夏天来到，草原变得郁郁葱葱，阳光下显出一派诱人的景色。达维多夫到第三生产队检查割草工作。他在老远就看见有好几台割草机没有开动，走近了，看见好几个哥萨克在打牌。他非常生气：

“为什么不割草？”

“今天是星期日。”

“可是天气会等你们吗？万一下起雨来呢？”

“娘儿们和姑娘们都去做礼拜了，没有人赶马。”

“你们这八个人为什么不可以开动四台割草机呢？”

“工人在星期日都休息，我们也应该休息。苏维埃政权指出，在劳动人民中间待遇不应该有差别，你们歪曲法律，为了自己的利益改变法律。”哥萨克乌斯金挑战似地回答说。

“你怎么胡说八道？”达维多夫激动地喊道。“我要保证农庄的牲口和你们的小牛冬天都有草吃，怎么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呢？”

“你们只顾完成计划，你巴结区里，区里巴结省里，弄得我们只好为你们受罪……主席，你最好跳下马来，跟我们一起玩牌……”

站在乌斯金身后的哥萨克笑了，达维多夫气得呼呼喘气，他对乌斯金从头到脚瞧了瞧，跳下马来：

“好吧，分牌！”

形势的转变出乎意料，达维多夫越是镇静，乌斯金越是不安。他没有打完一圈牌，就懊恼地说：

“打什么牌呢，还是谈谈休假日吧，主席，你以为只有人才关心休假日吗？不是的。早晨我去套马，那马叹了一口气说：乌斯金，乌斯金，集体农庄过的是什么生活呀，白天黑夜都干活儿，连休假日也不让我轻松一下。以前我过的日子可不是这样。以前星期日从来不叫我干活儿，只偶尔拉着车子去作客……”

哥萨克都轻轻地笑起来。达维多夫低声问：

“这马以前是属于谁的呀？”

“你以为是属于我的、替我说话吗？不是的，这是从富农那里清算来的。这匹马一直过着好生活，吃燕麦吃得牙都掉了……”

“那你不应该听这匹马的话，”达维多夫说，“因为富农的马讲的是富农的话。”

“现在它已经是集体农庄的庄员了。”

“表面上你也是集体农庄的庄员，而实际上却是富农的应声虫。再说，这马也老胡涂了。如果它年轻一点，就会这样对你说：唉，乌斯金，乌斯金，你冬天不干活儿，春天装病，到现在还不干活儿，你叫我靠什么过冬呢？你自己冬天吃什么呢？这样干咱俩都要饿死了！”

一片笑声淹没了达维多夫的话声。乌斯金也跟着笑了起来。一个长胡子的老哥萨克说：

“达维多夫说得对，割草不能耽搁，干咱们庄稼活儿的，冬天才能有假期。”

大家都高兴地干活儿去了，乌斯金还帮助达维多夫赶车把做礼拜的娘儿们和姑娘们追了回来。

达维多夫每日都很繁忙：照顾农活儿；检查学校校舍的修理工作；分配食物给女教师……他听取新区委书记聂斯杰连科的意见，以极大的热忱关心群众，关心每一个人。通过深入群众，他了解到杀死诃普洛夫夫妇的，可能就是他所信任的奥斯特洛夫诺夫经理。

在这些日子里，达维多夫也深刻反省自己不应陷入一件不体面的恋情之中。路什卡原来是纳古尔诺夫的老婆，因为她和地主的儿子季莫菲在一起鬼混，纳古尔诺夫赶走了她。前一段时间，她又死死地缠住达维多夫，达维多夫下了很大决心才与路什卡彻底分手。村里一个纯洁的姑娘——华丽雅爱上了达维多夫。达维多夫非常珍贵这种真诚的爱情，他与华丽雅正式订了婚，然后又送她去农业学校学习。

纳古尔诺夫仍然像一个战士那样生活，时刻关心革命事业。白天和妇女们一块儿在田里除草，晚间，他的房里总亮着一盏油灯，他坐在窗前，为世界革命而学习英语。不久，舒卡尔老爹也来和他一起学习了，不过舒卡尔老爹念的是一本俄语词典。夜半时分，全村一片寂静，纳古尔诺夫和舒卡尔老爹欣喜地倾听着鸡鸣，赞赏公鸡的美妙的歌声。

“就好像在大主教的礼拜堂里一样！”舒卡尔老爹说。

“好像在骑兵队里！”纳古尔诺夫说。

他们就这样夜夜学习，夜夜听鸡鸣。一天夜里，地主的儿子季莫菲从流放地逃回来，偷偷地摸进村里，用步枪从窗外向纳古尔诺夫射击。纳古尔诺

夫立即吹灭油灯，跳过窗子追出去，同时用手枪向他还击，但是季莫菲已经逃远了。从这夜以后，纳古尔诺夫每夜都在路什卡的住所旁边守候季莫菲。路什卡以前是季莫菲的相好。纳古尔诺夫判断，季莫菲这次潜逃回来，一定要来找路什卡。第三夜纳古尔诺夫终于在这里击毙了季莫菲。

集体农庄的事业在格列米雅其村蓬勃地发展着。联共党支部接受了几个积极分子入党，生活面貌在一天天变好。庄稼收割之前，村里来过两个装扮成牲口采购员的肃反干部，他们在村里寻找波罗夫采夫的线索。可是他们刚刚离村就被枪杀在路上了。两个肃反干部的被害，引起了格列米雅其村党支部的高度警惕，纳古尔诺夫、达维多夫、拉兹苗特诺夫开始夜夜监视可疑的人家。一天夜里，纳古尔诺夫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走进奥斯特洛夫诺夫的家。纳古尔诺夫急忙叫来达维多夫和拉兹苗特诺夫，他们带着枪向奥斯特洛夫诺夫家走去。纳古尔诺夫布置拉兹苗特诺夫守在窗口，然后就和达维多夫一起向门口走去。他上了台阶，敲开了奥斯特洛夫诺夫的房门，右手握着手枪，左手摸到波罗夫采夫的房间的屋门。他突然一脚踢开屋门：

“谁在里面？我要开枪了！”

他的话音刚落，一颗手榴弹在门边爆炸了，纳古尔诺夫当场被炸死，达维多夫冲进小屋开了两枪，随后便被机枪击中，倒在地上。两个敌人从窗口逃出，廖切夫斯基被拉兹苗特诺夫击毙，波罗夫采夫侥幸逃脱。

几天以后，波罗夫采夫终于和十几个妄图在南方发起暴动的白军军官和将军们全部落网，六百名参加阴谋活动的哥萨克，被判处不同刑期的徒刑，反革命阴谋彻底失败了。纳古尔诺夫和达维多夫牺牲后，生活在继续前进，但人们的心情有了很大变化：愉快的舒卡尔老爹变得孤僻、寡言，他常常一个人坐在墓地的板凳上叹息、流泪、划十字……夜越来越长，越来越黑，时而从高空传来鹤的哀唳，雁也凄凉地呼应着。在这年最末一场雷雨即将来临的时候，拉兹苗特诺夫来到在国内战争期间受白匪军侮辱而自杀的妻子的墓前。他伫立良久，悲伤地望着远方，听见从阴云密布的天端传来了这一年的最后一次雷鸣。

《被开垦的处女地》通过农业集体化时代宏伟的、动人心魄的画面，通过一明一暗两条随着事件体系而交叉发展的情节线索，充分表现了贫农、中农同富农、白军旧军官分子这两个阵营之间的激烈的斗争，以及人民内部的矛盾冲突：共产党员和村民之间的矛盾冲突，村领导和区领导的矛盾冲突，不同领导作风的冲突，日常生活的冲突，农民克服自身私有观念的深刻的内心斗争等等。肖洛霍夫以革命的激情，描写了农村旧的所有制的覆灭，歌颂了经过痛苦的斗争才艰难地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主义的人与人的关系。作者在书中再现的现实生活是复杂的。集体化运动时期贫农、中农和富农、白军分子之间的斗争，既是国内战争期间斗争的延续，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内容与新的性质。这是从昨天的限制富农阶级到今天的消灭富农阶级的重大演变，这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必然胜利的历史过程。

达维多夫、纳古尔诺夫、拉兹苗特诺夫等主人公，在复杂的事件纠葛与阶级斗争中、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在日常生活和个人的感情中显露了自己的性格。他们的性格鲜明地反映出时代的内容与历史转折时期的特点。这是肖洛霍夫塑造人物的一个鲜明的美学原则。这部小说发表后，不少批评家盛赞小说中的主人公，称他们为“当代英雄”。他们既是平凡的劳动者，又是自己时代的真正的主人。他们昨天曾经出生入死地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战

斗，今天又忠心耿耿地为农业集体化事业而献身。他们表现出战士的英雄主义和劳动者的优秀品德。可是他们又都是鲜明的个性化了的人物，各自有着自己不同的经历和性格。

农民从一个单干户转变成一个集体农庄的庄员，并不是简单地改变一下劳动方式就可以了，这个过程是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过程，是克服千百年来私有者的思想感情的过程。书中梅谭尼可夫的形象，在体现这一主题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肖洛霍夫塑造的敌人形象也充分反映了生活本身的内在逻辑。

这部书的结尾是悲剧性的，调子是低沉的，作者过于急促地结束了这些可爱的主人公的生活历程，以致使人觉得在集体农庄的未来的生活上蒙上了一层阴影。当然，人们还要继续在建设新生活的道路上胜利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部书，以事件的丰富和紧张而论，以众多人物性格的鲜明和深刻而论，可称得上是苏联文坛反映农业集体化时代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人的命运》

这部短篇小说是作者经过十年酝酿之后，在几天之内写成的，发表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之交的《真理报》上。这篇小说在结构上采用了故事中套故事的方式，主人公安德烈·索科洛夫关于自己苦难的讲述镶嵌在作者的旁白之中。

战后的第一个春天，草原上积雪初融，河水泛滥，道路泥泞难行。在这交通阻塞的日子里，我正巧要到布康诺夫镇去。我和汽车司机乘一条平底小船渡过叶蓝卡河。司机从村子里开出我们去冬放在那里的一辆旧吉普车，又划船到对岸去接我的同伴。我独自坐在一排倒下来的篱笆上等他们。

村庄离得很远，埠头附近一片寂静。微风送来初春土地的新鲜而又难以捉摸的香气。一会儿，我看见有个男人拉着一个很小的男孩子，从村庄尽头走来，他走到汽车旁边，转向我低沉地说：

“你好，老兄！”

“你好！”我握了握他的又长又硬的手。

他弯下身子对孩子说：

“问伯伯好，乖儿子。你瞧，他跟爸爸一样，也是个司机。只不过咱们开的是大卡车，他开的是这种小车子。”

那孩子用一双像天空一样清澈的蓝眼睛朝我望望，露出一丝笑意，大胆地伸给我一只嫩红的冰凉的小手。

那父亲摘下背包，懒洋洋地在我身边坐下来，说：

“怎么，老兄，是在等你的首长吗？”

我觉得不便向他说明我不是司机，就回答说：

“得等一会儿啦。”

“那咱们就来歇一会儿吧，反正我也不忙着上哪儿去。刚才我走过来一看：有个咱们的司机弟兄的车抛锚了，我想，让我去跟他一块儿抽阵烟吧。抽烟也罢，死也罢，一个人总是很难受。你怎么，战争时期一直在前线开车吗？”

“差不多一直在开。”

“唉，老兄，我在那边可吃够苦头啦。”

他把一双黧黑的大手搁在膝盖上，弓起了背。我从侧面望了望他，不知怎的忽然感到很难受……你们可曾看到过那种仿佛沉浸在极度悲痛中、充满了绝望的忧郁、叫人不忍多看的眼睛吗？在这位偶然碰到的对谈者的脸上，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双眼睛。

他沉默了一阵才开口：

“有时候夜里睡不着觉，在黑暗中睁大一双眼睛想想：唉，生活，生活，你究竟为什么要那样折磨我？为什么要那样惩罚我？不论黑夜，不论白天，我都得不到解答……不，永远得不到。”他忽然醒悟过来，亲热地推推儿子凡尼亚说：“去吧，宝贝，到河边玩去。”

他用眼睛送走儿子，继续说道：

“我是一九二二年生的，国内战争时参加过红军。在饥饿的一九二二年，到古班给富农当牛马，总算没有饿死。可是父亲、母亲和妹妹都在家里饿死了。我的老婆伊林娜也是个孤儿。她可真是个好姑娘，又快活，又温柔，又聪明，又体贴，对我来说，天下没有比她更称心的人了。不久我们生了个儿子，过几年又生了两个姑娘。一九二九年汽车吸引了我，我就开起卡车来。一晃过了十年。我们在战前积了点钱，盖了一座小房子，有两个房间，还有贮藏室和走廊。伊林娜又买了两只山羊。人生在世还需要什么呢？孩子们吃得足牛奶糊，有房子住，有衣服穿，可以说心满意足了。可是这时候战争爆发了，我就要奔赴前线。我在车站上跟孩子们和伊林娜告别。伊林娜哭得嘴唇都肿了，眼睛混浊无神，浑身哆嗦，抽泣呜咽地说：‘我的亲人……咱们……今世……再也……见不着面啦！’

“战争开头一段时间，家里常有信来。不过我连一年仗都没有打满，就在开汽车送炮弹的路上被一发炮弹震昏过去，等到醒来的时候，我落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了。我好不容易站起来，东倒西歪地走了没有多远，一队我们的俘虏赶了上来，都是我们同一师的。约莫有十个德国兵押着他们。那个领队的赶上来，拿枪柄用力朝我头上打了一下。我要是倒下的话，他准会一梭子把我结果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弟兄抱住了我，扶着我走了半小时的样子。我们中间那些受伤的、跟不上大伙儿的，就在路上被枪毙了。夜里我们被关在一个村庄的教堂里过夜。我们被俘的战士中有个军医，他在黑暗中摸着走，悄悄地问：‘有受伤的吗？’他给我端上了脱臼的胳膊。这才是真正的医生！他就是当了俘虏，还干着自己的伟大事业。

“在黑暗中，大家压低嗓子说起话来。我听到我旁边的两个人也在悄悄地说话。一个说：‘如果明天要我们供出共产党员和犹太人，那你，排长，可别躲起来，我第一个就把你指出来……’另一个年轻的声音回答道：‘我一向就怀疑你不是好人，不过没想到，你会成为叛徒。’他们沉默了，可是我给这卑鄙的行为气得直打哆嗦。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帮助那个排长用手拚命掐死了这个叛徒。第二天早晨，果然德国党卫队军官问，谁是共产党员，谁是指挥官，谁是政委。可是没有一个是出卖同志的坏蛋。从两百多人中他们只抓了四个人，一个犹太人和三个俄罗斯人，因为这三个人都是皮肤浅黑，头发卷曲。这四个人被枪毙了。我们继续被赶着上路，直赶到了波兹南的俘虏营。

“从第一天起我就想逃回自己人这边来，五月底才有了一个机会。我们被派去在俘虏营旁边的树林子里给死去的俘虏挖坟墓，我悄悄地从一丛灌木

后面逃走了，一直往东方跑，第四天我被骑摩托车、带着警犬前来追捕的德国兵给追上了。警犬把我咬得血肉模糊。我又被带回了俘虏营。但是我没有死，还是活下来了。

“在被俘的两年中，他们驱赶着我走遍了半个德国。他们让你干活儿，他们打你，就因为你是俄罗斯人，就因为你还活在世上……九月里，我们被派到采石场干活儿，定额是每个人每天四立方米。当时大家就是不干活，也只剩下一口气了。有一天晚上下了工，回到营房，我把破衣服扔在木板床上，发牢骚说：‘他们要我们采四立方石子，其实我们每人坟上只要一立方米也足够了。’我们中间有个坏蛋，他把我这些牢骚话向营的警卫队长米勒告密了。

“第二天晚上，米勒打发人来叫我。我跟同志们告了别，他们都知道我是送命去的。我走到院子里，抬头望着星星，跟星星也告了别，心里想：‘你的苦可吃到头啦，安德烈·索科洛夫。’不知怎么的，我忽然可怜起伊林娜和孩子们来，后来这种怜爱的感情也消失了。我开始鼓起勇气来，好跟一个士兵应该做的一样，毫无恐惧地看着手枪的枪口，不让敌人在我最后的一分钟，看见我也很舍不得离开人世。“在米勒的办公室里，窗台上放着鲜花，干干净净。桌子周围坐着全营的五个军官，他们狂饮着白酒，吃着咸肉。米勒玩弄着手枪，同时眼睛瞧着我，他说他特别抬举我，为了我说的话他要亲自枪毙我。我回答道：‘听便’。他站起来，倒了一杯酒，拿了一片面包和咸肉给我，他说：‘临死前干一杯吧，俄国佬，为了德国军队的胜利。’我一听这话，全身像火烧一样，心想：你未免太过分了，我反正要死了，你跟你的白酒给我滚吧！

“我把酒杯和面包放在桌上说：‘谢谢您的招待，我不会喝酒。’他微笑着说：‘你不愿意为我们的胜利干杯吗？那你就为自己的死亡干杯吧。’‘我愿意为自己的死亡和摆脱痛苦干杯。’说完拿起玻璃杯喝了下去，但是没有动点心。他让我吃些点心，我回答他说，我只喝一杯酒是不吃点心的。他又倒了第二杯、第三杯。我喝完第三杯以后，也只咬了一小口面包，我虽然饿得要命，但决不会因为他的恩惠噎死。我有我做俄国人的骨气和骄傲，他们不论用什么手段，都不能把我变成畜生。

“随后，米勒把手枪放在桌子上，走到我面前说：‘索科洛夫，你是一个真正的俄国兵。你是一个勇敢的军人。我也是个军人，我尊敬值得尊敬的敌人。我不枪毙你了。再说，今天我们的军队占领了斯大林格勒，是个喜庆的日子，因此我送你一条命。’说着从桌子上拿起一个不太大的面包和一块咸肉，交给我。……这样，死神又一次从身旁滑了过去。

“到了一九四四年，他们派我去给一个德国少校级工程师开汽车。我开车送这个工程师到接近前线的地带去修防御工事。两年来我第一次听到我们的炮声。我想，我逃跑的时刻到了。一天，我送那个少校去修工事，在路上我打昏了他，带着他从德国人前沿阵地的两个火力点中间冲过来，回到了自己的部队里。我们部队的师长感谢我带来了这个礼物，并且说，先送我去医院治疗，再给我一个月的假，让我回家看看，然后再分配我工作。等到我从医院回到家乡的时候，看见我们住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很深的弹坑。一位邻居告诉我，一九四二年六月，一颗炸弹落在我家的房子上，伊林娜和两个女儿当时就被炸死了。儿子正好没在家，后来儿子申请上了前线。我站在深坑旁边，感到刺心的疼痛，当天就回部队了。

“过了三个月，太阳又从乌云里出来了，我在前线找到了当炮兵连长的儿子，他已经是元帅了。我想，我这一辈子已经完了，可是儿子，元帅的日子还在前面呢！夜里醒来，我常常做着老头儿的梦：等战争结束，我就给儿子娶个媳妇儿，自己住在小夫妻那儿，干干木匠活儿，抱抱孙子。可是连这梦想也落空了。五月九日早晨，就是胜利那一天，我的儿子被一个德国兵打死了……”我在远离故乡的德国土地上，埋葬了我最后的欢乐和希望。儿子的炮兵连放了礼炮，给他们的指挥员送葬。我的心里仿佛有样东西断裂了……不久我复员了。我到乌留平斯克一个老朋友家住下，在汽车队里开车，就在这时候我认下了我的新儿子凡尼亚。就是那个在河边玩的孩子，他也是个孤儿。”

这当儿传来了我同伴的叫声和划桨声。这个陌生的、现在对我说来已经觉得是很亲近的人，站了起来，向我伸出了手：

“再见，老兄，祝你幸福！”

“祝你们一路平安！”

男孩子跑到父亲跟前，拉住父亲的衣襟，在父亲旁边快步地跑着。

两个失去亲人的人，两颗被空前强烈的战争风暴抛到异乡的砂子……什么东西在前面等着他们呢？我希望：这个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的人，能经受一切；而那个孩子将在父亲的身边成长，等到他长大了，也能经受一切，并且能克服自己前进路上的各种障碍。

我怀着沉重的忧郁心情，目送着他们……凡尼亚连蹦带跳地跑了几步，忽然向我回过头来，挥动右一只小手。刹那间，仿佛有一只柔软而尖利的爪子抓住了我的心，我慌忙转过脸去。不，在战争的几年中白了头发、上了年纪的男人，不仅仅在梦中流泪，他们在清醒的时候也会流泪。这时重要的是能及时转过脸去。这时最重要的是不要伤害孩子的心，不要让他看到，在你的脸颊上怎样滚动着怜惜而伤心的男人的眼泪……

《人的命运》这篇小说，结构严谨，语言朴实，以短小的篇幅揭示了丰富的内容。小说的题名也颇具匠心，它本身就蕴含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深意。作者的引子、旁白和抒情的结尾，同主人公安德烈·索科洛夫的讲述，浑成一体，自然而和谐。作者的独具匠心的叙述，使这篇短小的作品具有了某种史诗般的雄浑、宏伟、深沉的特色。

肖洛霍夫创作的艺术特色

肖洛霍夫是一个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苏联作家。他的创作反映了革命和国内战争、农业集体化运动、卫国战争等历史时期的苏联人民的生活，特别是顿河哥萨克的生活。肖洛霍夫始终把历史转折时期的急遽多变的事件、复杂纷繁的社会冲突、哥萨克走向革命的曲折道路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变迁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他善于表现动荡时代的形势和复杂的矛盾斗争，善于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反映社会变革当中的人民生活的深刻变化。由于这一特点，一些批评家称他为史诗作家。同时肖洛霍夫又善于描写历史争剧转折时刻的悲剧性冲突和悲剧情势，因此，一些批评家又称他为悲剧作家。他的作品在苏联文学中独树一帜，开创了悲剧史诗的艺术风格。

肖洛霍夫反映现实生活不是静止的，他把客观现实本身的发展、变化、纠葛、发展中的矛盾和矛盾中的发展都深刻地揭示出来。我们阅读《静静的

顿河》仿佛从一个恬静的哥萨克社会很快进入到一个瞬息万变、错综复杂、动荡纷乱的历史进程之中。《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描写伟大集体化年代的生活，也令人有一日千里之感。此外，作家在描写巨大历史事件时，有时把历史文献性资料引入自己的叙述当中，从而增加了作品的历史真实感，使作品具有编年史的特点。《静静的顿河》中关于一九一六年十月至一九一八年晚春的历史事件的叙述，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特点，历史前进的铿锵的步伐以其真实的力量感染着我们，历史的本来面貌十分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不过，有时由于作家让历史事件中的真实人物纷纷出场，又拘泥于历史真实事实的描写，从而显露出史料堆砌的痕迹，妨碍了艺术形象的塑造，减弱了作品的艺术性。一九三七年肖洛霍夫本人在谈话中也承认了他在这方面的弱点。他说：“编年史的部分是不合我心意的。这里可能表现了我的局限性。我不得不抑制自己的想象力。”

肖洛霍夫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不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直书复杂的生活真实。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针对布尔什维克党所执行的哥萨克政策；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强迫命令和三十年代广大布尔什维克向往世界革命的饱满激情；在《人的命运》中对苏维埃人在战争中和战争后的遭遇和所思所想，都直率地说出自己的认识和态度。然而，他在表现这种率直的过程中，有时为一些表面现象所困扰。以致在某些场合出现了诸如作家的立场同葛利高里的立场没有明显地区分开，把纳古尔诺夫一些可贵的品质漫画化，以及在反映革命的正义战争时壮烈不足而哀伤有余等情况。

从本世纪初开始，俄国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极为动荡的、充满了斗争和变革的历史道路。在一系列重大的革命和战争的事件当中，几乎整个社会都卷入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当中。这里往往不允许有回避和妥协存在，也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在这样的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充满了破坏和建设的历史巨大转折时期，随时都可以看到有悲剧情势的出现。肖洛霍夫作为一个长于描写悲剧的作家，敏锐而深刻地把握住具有历史本质意义的新社会、新制度、新事物诞生时所伴随的“阵痛”，并且以他特有的悲剧作家的笔力将这种“阵痛”表现在他一系列作品中。葛利高里的悲剧命运和《被开垦的处女地》的悲剧结尾，乃至索科洛夫充满悲剧的生活道路，在性质上是迥然不同的，但其出现却都是基于新旧两种社会、两种力量的伟大斗争，因而从总的方面来看便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尽管作家在强调人们对历史前进应该付出的巨大代价时，常常不免流露出感伤的情调。

肖洛霍夫的人物，多数具有深刻的典型性，同时又都是活生生的，具有鲜明的个性。正如绥拉菲莫维奇所说：“他的人物不是画出来的，也不是写出来的，他们不是纸上的人物，而是一群活生生的，光华夺目的簇拥而出的人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鼻子，自己的皱纹，自己的眼睛和眼角上的鱼纹，都有自己说话的语调。每个人走路和转头的姿态都各自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笑声；每个人按照自己特有的方式去恨。爱情的明亮、爱情的光辉和爱情的不幸也因人而异，各具特色。”

俄国文学塑造了无数成功的农民形象。肖洛霍夫塑造的哥萨克农民形象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他们不再是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旧时代的受苦受难、屈从忍让的农民，也不是潘菲洛夫笔下的被自发的“土地的权力”培养起来的农民，更不是某些其他作家笔下的懵懵懂懂的芸芸众生，他们是在

历史发展中积极活动着的人们，他们以自己的积极活动参与历史的伟大变革，他们的命运反映着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进程又决定着他们的命运。葛利高里在革命和国内战争中积极地寻求“真理”。作家在他身上充分而深刻地表现了哥萨克农民所具有的属于新和旧、属于未来和过去的本质。达维多夫、纳古尔诺夫、拉兹苗特诺夫、索科洛夫积极地影响着历史的进程，在历史的进程中鲜明地显示了他们性格的真、善、美。

肖洛霍夫笔下的农民形象具有极为丰富的感情世界。这在俄国文学中农民形象的塑造方面的确标志着一个新水平。肖洛霍夫的人物都生活在丰富的感情当中。对劳动、对自然的热爱，是肖洛霍夫笔下人物的优美的品格之一。温厚的友谊、忠实的爱情，女人的热情与柔情，美好的母爱，父亲的自豪，快乐与痛苦，迷惘与悲伤，对幸福的不断追求，对真理的探索……这一切感情都被肖洛霍夫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又都融汇在社会的生活当中。

肖洛霍夫善于描写人物心灵的千变万化，善于表现人物的复杂的心理与复杂的感情。娜塔莉亚在暴风雨中诅咒葛利高里，让上帝惩罚他。她由于深爱葛利高里而痛苦，又由于痛苦而愤怒，而不平。可是在临死时，她对葛利高里深切、热烈的爱情一下子又放射出奇异的光辉，她要求婆婆在她死后给她穿上葛利高里喜欢的那条裙子，她为不能最后见到葛利高里而惋惜，她嘱咐儿子米沙特加把她的吻和她的爱转达给葛利高里……

肖洛霍夫描写人物，始终把他们置于社会生活之中，置于大自然的背景之中。在他的作品中人、社会、自然和谐地构成一个统一体。人物心灵的变化，反映着历史事件的发展和社会生活，而自然景物又随着人物心灵的变化而变化。葛利高里从布琼尼的骑兵队伍中复员的时候，坐着牛车走过秋天的草原。此时他的心情反映在他看到的草原景物之中。他本想在红军队伍中干到把自己的罪赎回来为止，然而由于过去的问题，红军队伍又不信任他。他坐车回家，心中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欢快。他眼里的草原死一样的沉寂，好像是被施了妖法，四周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也没有鸟儿飞翔。使人伤感的高度寂静笼罩着万物。“好像这条道路是没有尽头的。这条道路蜿蜒曲折地下到山谷里去，然后又伸到高岗的顶上来。极目一望——四周到处是这样沉默的、大片的草原。”

景物反映出葛利高里孤独、痛苦、茫然的心情。他曾走上歧途，参加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然而他认识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投入红军队伍，想以英勇的战斗来赎回自己的罪过。可是这最后的赎罪的希望也失去了，他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独的人，他感到前途茫茫，不知所措。

总之，肖洛霍夫以他出色的作品，为读者展示了一个丰富多采的、独具一格的艺术世界，而“这个世界是那样的奇特，那样的真实，这里面有多少巨大深沉的人的激情啊！”

